

社會價值論目錄

下篇 價值學說史的發展

一、導言.....	(六七)
二、價值學說史略.....	(七七)
三、李加圖的價值論.....	(七七)
四、馬克思主義的價值理論.....	(九九)
五、馬克思主義的價值批判.....	(一一一)
六、社會價值論簡說.....	(一一六)
為消費而生產.....	(一一六)
資本主義前.....	(一一七)
僱傭勞動.....	(一一八)
歷史的圖畫.....	(一一八)

生理的意義	(一一〇)
產業革命後	(一一一)
經濟恐慌	(一二四)
生產消費之不平衡	(一二六)
從工人身上所剝削的部份	(一三〇)
尊尚弱小民族身上剝削	(一三三)
歷史社會勞動積累的兩種形式	(一三六)
帝國主義者間的參差	(一三九)
『社會平均必需勞動』是爲了『社會平均必需消費』	(一四〇)
民生是歷史的重心	(一四二)
孫中山先生有關社會價值的語錄	(一四二)
本文出版附言	(一五〇)

社會價值論下篇

價值學說史的發展

一、導言

本文上篇的中心意義，在指出：

(一)生產力擴大到了帝國主義的時代，生產關係已是發展到了帝國主義國家與弱小民族的對立形勢。

(二)到了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弱小民族反帝國主義侵略的國民革命，正領導着世界歷史行程的進展。

(三)半殖民地的中國直接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

(四)上面這三種歷史事實惟有『社會價值論』足以說明。

本文上篇對於上列四點說明雖欠充份，但已經有力的指出了。凡是一個對三民主義有研究的人，很容易知道這種理論是完全根據孫中山先生的原則出發。

價值學說在歐洲產業革命的過程中曾聚訟紛紜，莫衷一是。但每一家價值學說之建立，都莫不有其時代的背景。

一個英國人看見環繞三島四週的海水，自會深深地感到海也是財富的源泉之一的。因為海不僅供給食鹽及海產諸食品，同時還可藉海和大陸上交通，獲取必需品。土地更容易看作財富的來源。沒有土地，就沒有食物，沒有五金，沒有草木，……。正如在中國，有人以為金、木、水、火、土五行是天地間五大要素，也如印度佛徒以地、水、風、火是宇宙之四大構成，其來源是同一的道理。我以為西歐兩三百年來諸家價值學說的內容也正是這樣。對於價值學說之貢獻，都值得提供研究者的參考，他們對於價值學說之正確的構成都有着若干的功績。

作者在本文上篇曾說過，馬克思在十九世紀中葉長期居於倫敦，親眼看見那些終日勤勞的工人生活困苦的情形，而貴族富商則驕奢淫逸。因而從西歐諸家的價值學說中，尤其是李加圖的勞動價值論中，分析其得失，得出『剩餘價值論』的結論。『剩餘價值論』確含有一部份的事實，而且馬克思的理論着重在為社會鳴不平，所以最易得到廣泛的同情。這是馬克思主義所以為世界各國若干人士所擁戴的原因。

馬克思將勞動力的價值置於『維持勞動力的所有者的生命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的基礎上

，這是近於事實的。列甯更將『勞動者和他們的家眷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作為勞動力的價值，更接近於事實。機器發明以後，這種理論，符合於事實之處，在：

- (一) 雇主因有了機器可能的付足了勞動的價值，而不妨礙他獲取利潤；
- (二) 在有弱小民族可供剝削的帝國主義國內的工人，可能得到較這種價值——勞動所有者及其一家人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更高的工資。

但是：

(一) 沒有機器時，在僱傭勞動下，雇主從來沒有對雇工付足了勞動力的價值，更沒有付足了雇工家屬所需生活資料的價值。

(二) 奴隸制度與農奴制度之剝削關係即建立在奴隸總是吃得不夠、喝得不夠、衣服穿得不夠，以及農奴的家人生活困苦的基本之上。奴隸的短命在沒有得到適量的消費。

(三) 有了機器以後，沒有機器的人全部是被剝削者。無論是工人也好，農民也好，尤以那些不能勞動的老人、小孩和病人為然。

(四) 在帝國主義國內，惟有失業者才感生活的困難。而生產力擴大了，人工減少了，失業者總是比一天增加的。不讓失業者失業，惟有令他們造燬滅這世界的武器。

(五)帝國主義國內的資本家從工人身上所剝削的已經不是他們的「剩餘勞動」，而是因生產力之擴大工人所應享受的「社會平均的必需消費」。

(六)「社會平均必需消費」不僅是工人應該享受，而不能做工的老人、小孩、病人、正在生育小孩的婦女，也同樣應該視其需要而平均享受。

(七)所以有了機器以後，資本家利潤的來源是：私有了擴大生產力的機器，不將應該提高社會消費水準的部份公諸社會來分配，而讓諸少數人所私有。

產業革命後，一切社會問題的中心都在這裏。

這樣，祇有社會價值論才能說明。

馬克思說，「價值是社會關係」，這是對的。但他將表現價值尺度的交換價值當作了人類社會關係的本體，這是不對的

交換祇是一種臨時的過程，是一種社會形式。人與人的社會關係的物質基礎在從有用物品的生產到消費的全部過程。這是爲了生活。對人類生活上沒有用的物質是加不進人類的社會關係來的。

將自然力擴大的引用到人類生活中來，這是人類歷史的總要求。太陽光、空氣、水、電，……已漸漸的一天比一天多的引用到人類生活中來。沒有交換價值的日光和空氣已經過攝取了紫外線

和提取了的鑿素而開始買賣。無線電的多方的應用，使在任何場所都存在的看不見摸不着的電氣都將引用到人類生活中來。但這都是爲了更幸福的人生。

而弱小民族反帝國主義侵略的革命運動正是全世界十二萬萬五千萬人在這生產力已擴大到了今日的世界，爲謀平等幸福的生存。

這就是社會價值論時代的背景。同時也說明了爲甚麼民生是歷史的重心。

二、價值學說史略

『勞動價值論』并非馬克思所首創。在中國，早已有着『民生在勤』的格言。一六四二年有美國作家霍伯士(Thomas Hobbes 1588—1679)所著『市民論』一書中，即會指出勞動爲國民財富之來源。其時尚在馬克思出世一百七十餘年前。

其後華格翰(Rice Vaughan)在一六七五年出版的『錢幣及貨幣之研究』一書中，認爲價格的固定尺度是表現在工人奴僕的工資中。白退(William Petty 1623—1697)在論金剛石貿易時，認爲金剛石之採掘與運輸所耗勞動量在買賣金剛石的價格上有着決定的作用。他以爲『勞動是財富之父和主要的原素，土地是財富之母』。著名的哲學大家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也說：『

我們說，有十分之九有益於人類生活的土地生產物是勞動之結果；這種說法，我以為是十分正確的。我們若將我們用的諸種物品加以正確的估計，並區別其各種費用，以求何者純粹是自然所賜予，何者為人力所造成，則必將見在大多數情形之下，其中百分之九十九完全是由勞力所造成。『若麵包所值比醬子所值為大，酒所值比水為大，布或絲織物比樹葉、樹皮、地苔為貴，那是完全由於勞動和勤力的原故。』洛克根據這種價值論出發，建立了他的私有財產起源之哲學法律上理論的基礎。

名哲學家柏克萊 (Bishop George Berkeley 1685—1753) 也曾說：『四種原素和人類勞動，實質上是富之真正來源。』『以為土地本身就是構成財富的原素，不是很錯誤的嗎？若以土地為財富之構成原素，那麼，是不是把國民的勞動亦看為創造財富的東西，看為土地本身和銀的價值？是不是以牠們的得有價值祇因為牠們是勞動的工具和動機之故呢？』而洛克與柏克萊都是以市場價格是與需求成正比例，而和供給成反比例，認為交換價值是因社會關係來規定，而不是由內在價值來規定，開始將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分別開來。

休謨 (David Hume, 1711—1776) 更認為『勞動是幸福和權力之來源；人類(勞力)和商品是每一民族社會之真正的和現實的力量。』一般人都認為休謨的意見是馬克思『近代社會的財富是巨大的商品積聚』這一理論之先驅。

實業學派康梯隆 (Richard Cantillon, 1680—1734) 在其所著『商業性質概論』中，首先分析生產諸因素說：『土地是財富之來源或財富之物質；人類勞動是財富形態之創造者。而所謂財富，其本身除了存在於生活資料中、安樂中、及生活滿足中，以外便別無所有。土地提供草、根、穀物、蔗、森林、各種樹木，各種菓實、樹皮、和樹葉（蠶所需之桑樹），并提供礦產五金等；人類勞動則使所有此等東西得有富的形式。』又說：『五金之實在的或內在的價值，亦如所有的物品之價值一樣，是和牠們所由生產所必需的土地和勞動成正比例的。』他是受白退的影響的，都以為土地與勞動為物品價值之源，并將土地生產物的價值和土地本身價值看成一個東西。

還有赫里斯 (Gosph Harris 1702—1764) 也具有同樣的見解。他在『論貨幣與錢幣』一文中，這樣說：『沒有土地的幫助，即無何種生活可言；沒有勞動，亦祇有貧困和衰弱。所以財富并不在於土地私有或土地和勞動生產物之私有。』他認為各國中土地及生產之最不相同的相對價值是看土地之肥瘠、人民勤奮及其體力之程度如何而決定。至於物之內在價值或原來的費用如何，并不是由滿足人們需要之實際效用性如何來決定，而是和生產貨物時所必需之土地，勞動及技巧成比例。『商品或物之相互交換，是適應於此等的比例，大多數物之內在價值是在此等天平之上加以估計的。』他舉例說，水是最有用的東西，但沒有一點價值；金剛石則相反，效用性最少，然而有最大的價

值。所以決定商品的交換關係，首先是以在物品生產時所應用之土地，勞動及人工技巧等相對的分量來作為標準。而勞動則在大多數的生產中都是形成價值的最大部份。人的不同需要和愛好，迫得他們不得不將自己的商品按生產時所消耗的勞動和人工技巧為比例而出賣。但赫里斯和康梯隆一樣，以為『供養一個工人的土地分量，便是他的工資，反過來說，這個工資便等於土地價值。』赫里斯將商品的價格和價值加以嚴格的分別，認為價格和價值的區別即在『商品之交換關係』和『勞動及工資所決定的商品之自然交換關係』之間的不一致，也可以說是在於商品交換關係的內在價值之間的不一致。此種不一致的程度是決定於商品的需求和該商品現存分量（即供給）之間的關係。『對於各種商品的需求的高或低，可使牠的價格高漲或低落——雖然牠的內在價值或原來的費用未有絲毫的變動……購買者對出賣者之關係，或各種商品之需求及牠的分量之間的關係，對於市場是永遠有影響的。所以，商品的品質雖然是更壞了，然而商品的價格都可以提高；例如『斗品質不佳的米，在一年中的某一時期內，可以比在同年別一時期內品質較佳而分量相等的米貴過許多。』

司徒亞德 (Sir James Stewart 1712—1780)，馬克思稱他是『完成資產階級經濟學之一波體系的第一個不列顛人。』他將『內在價值』(intrinsic worth) 和『使用價值』加以分別。『在這些物品中(即商品)，必須注意兩種情形：(一)牠的單純的本體或天然的生產物(自然物質)；(二)牠的改造

形態，即應用了人類勞動的物品。前者名之曰內在所值，後者名之爲使用價值，……改造形態之價值是依改造牠所需的勞動爲決定標準。」因此，內在價值常是牠自身中某些真實的東西；爲改造（物質之實體）而使用的勞動，則代表一部份人類的時間，係有用的消耗，使某些實體得到一種有用的、美觀的、質言之，直接或間接對人類有益的形態。」他以爲工廠製造品的價值是由於（一）生產該商品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二）工資，（三）原料的價值，三者合併而成。」若能知道這三項，就可決定製造品的價格。商品的價格不能少過這三項東西的總額——即牠的真實價值。超過這總額的，便是廠主的利潤。此種利潤常與需求有互相關係，所以是隨情形之不同而搖擺不定。」這是一種『生產費論』。他以爲，需求『有大』『小』『高』『低』之分，從而決定價格，從而決定工廠主的利潤。在交易中，買賣雙方都常發生競爭，以得到一種接近於通常水平綫的價格爲焦點。所以，司徒亞德以爲以價值律或價格律爲基礎的經濟條件，不是永久不變的，而是相對的且具有歷史的性質的。這些條件建立在交換條件之上，建立在生產物的商品性質之上，而生產物的商品性質及交換條件，其自身又是以分工爲先決條件的。

對於資本主義經濟學作過廣泛的研究因而享盛名的亞丹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對於價值論並沒有若何獨特的見解。他認爲『一個民族經年所消耗的關於生活上的必需品和種種享受皆

由該民族經年勞動之總和所供給。』『分工爲勞動生產力發展上最主要的成功。』他是正確明白的。劃分商品價值爲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二要素的第一個人。他說：『一切物品之真實價格，換言之，一切物品對於欲獲得該物品的人之實際代價，即是獲得此種物品所費之辛苦勞動。一切物品對於已獲得該物品的人，和願處分該物品或以該物品交換他種物品的人，其實際上之價值，是等於因佔有該物而能自己省免的，或因佔有該物而能轉加在他人身上的，辛苦勞動。』這便是交換價值之實質。在原始時代，全部勞動生產物屬於勞動者自己。既不分與地主，亦不分與企業家，生產物互相間之交換是十分自然的，皆以獲取該生產物時所必要的勞動量間之比例爲標準。譬如，獵取一隻海狸，常需一倍於獵取一隻鹿的勞動，於是一隻海狸乃可以交換兩隻鹿。此時勞動始成爲交換價值之來源，而勞動時間成爲交換價值之尺度。而由於技能所生產的物品之更高價值，則不過是獲得此項技能時所費去的時間和勞動之應得報酬而已。

自資本積蓄於特殊的人之手中，和土地成爲私有財產以後，勞動者便不能受取他自己勞動的全部生產物了。『對於預付工資和供給原料的資本，很明顯的亦須付以若干加添量，作爲牠(資本)的利潤。』最後還有那些欲不勞而獲在自己所未耕耘的土地上取得收穫的地主之地租。因此，工資、利潤和地租便成了構成交換價值的三大要素。而這三個構成部份各自的真實價值仍須取決於其各自所

能支配或購買的勞動量。『祇有其本身之價值始終不變的勞動，始能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較量各種商品之價值，換言之，祇有勞動是商品之最後的和真正的價值標準。』然而後來亞丹斯密又指出企業家的利潤係來自工人在原料上所加的價值。（見原書第二十二頁）這已是馬克恩剩餘價值論的萌芽。不過在亞丹斯密的全部立論上始終是承認利潤和地租是與勞動成爲商品自然價格的三大部份。而商品的市場價格則視特定時間內市場上供求關係情形或高或低或相等於自然價格，并受其調節。這自然是想使利潤和地租合理化而極其矛盾的說法。

三、李加圖的價值論

大衛·李加圖 (David Ricardo 1772—1823) 是以價值學說爲其經濟學體系基礎的第一人。李加圖繼亞丹斯密之後，將價值分爲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他以爲使用價值之意義，便是『效用』。至於此二者間之相互關係，他堅決以爲：并非一切具有使用價值的物品皆具有交換價值（如本與空氣）；然而物品欲具有交換價值，則該物品非具有使用價值不可。效用雖爲交換價值所不可少，然而效用并不能成爲交換價值之尺度。有用商品之交換價值的來源有二：稀少性及生產所必需的勞動量。凡是不論消耗多少勞動量皆不能增加其數量的『商品』，其交換價值全視欲得此物者之財力與嗜好而

定。在社會之初期，此等商品之交換價值或商品與他商品交換之決定標準，幾全視消耗於各物的相對勞動量而定。勞動量之尺度則為時間。他說：主張所有商品交換價值之來源（除了那些非人類的勞力所能增加的商品外）為勞動之學說，在政治經濟學上，是一個極重要的原則。」若實現於商品中的勞動量是商品交換價值的支配者，則勞動量之增加即為商品價值之增加，勞動量之減少亦即商品價值之減少。而生產時所消費的勞動量，與此種商品在市場上所可獲得的勞動量，有絕對之區別。生產時所費的勞動量，在某些條件之下，是價值之不變的標準；而商品所能獲得的勞動量則不然，牠和金銀及其他商品一樣，是可變的尺度，不足以測量牠物價值之變動。至於勞動之價值亦是同樣可變的，牠不僅要求其自身供求關係的影響，并且要受代表工資的生活資料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之價格之變動的影響。李加圖以為各種品質不同的勞動皆有不同的評價，此不同的評價是表現在勞動的市場價格中；牠的不同是隨勞動之強度及工人之比較的技術如何而定。

李加圖認為資本在任何時任何地都是生產所不可少的東西。即在原始社會中亦是如此。如獵人之人用器械，漁人之用漁具等皆是。然而資本（即器械、機器及建築等）自身亦是人類勞動的生產物，而牠的價值是決定於生產時所費的必需勞動量。資本之耐久力有大小，實現於資本中的勞動量有多寡，故牠移轉於所產物品（由此等物品而生產的生產物）內在價值亦有多少。

李加圖依資本消耗的遲速，分資本爲二類，一曰流動資本，一曰固定資本。流動資本之循環所歷時間之長短，在各種不同的生產情形下，是極不相等的，乃產生不同的價值和利潤來。

譬如：今有兩種資本，其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之比例各不相同。甲資本在一年之內僱用一百人、從事於機器之製造，乙資本在同一時間內以一百人在農村中從事生產。年終時，甲資本所產的機器之價值，必與乙資本所產的麵包量相等，因爲兩者都是等量勞動的產物。在第二年，甲資本若用此機器從事於羅紗之製造，（即用此機器并僱用一百人製造羅紗）而乙資本則仍用一百人從事於麵包之生產，此時羅紗製造者已將第一年資本所得的利潤加入於其資本之內，則第二年終時，羅紗之價值當略多於麵包價值之二倍。『因爲兩者資本之耐久程度不同，易言之，因爲這種商品在輸入市場前經過的時間不等，商品之價值便與投在商品內的勞動量不能恰成比例——牠們的價值比例不是二比一，而是略大於二比一；因爲較貴的商品在輸入市場前，中間所經過的時間要長些，所以需要相當的補償。』而工資騰貴，利潤必致下降，但工資騰貴對於兩種商品之相對價值的影響不同。使用較多固定資本的羅紗與專以流動資本生產的麵包比較，羅紗之價值是相對的降低了。（見李加圖著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所以，工資騰貴所引起商品相對價值變動之程度，是取決於固定資本及流動資本之比例，或商品輸入市場所必要的時間之長短。『在此二種場合下

，價值之不相同，是因利潤累積成爲資本，利潤既保留了一個時期而不使用，自應有正當的報酬。『固定資本之耐久力愈小，則其性質便愈近於流動資本。牠在短期間內即被消盡，牠的價值亦在短期間內即被生產出來。』『所以，在初期的社會中，因不常用機器或耐久的資本，由等量資本所生產的商品，即具有幾乎相等的價值；其價值之高低，皆因牠們所由生產時所需的勞動有多少之故。然自應用昂貴耐久的工具以後，即使以等量資本生產的商品，亦常具有極不相同的價值。商品之價值雖仍依牠們所由生產時所必需的勞動量之多少而發生相對的變動，然而除此以外，尚受其他原因之限制，即因工資及利潤之漲落而生的變動——雖然此種變動是很微小的。』（見前引書）

爲要確定商品真實價值之所有的變動，應有一種測量的尺度。然此種尺度常因兩種原因而不能存在，第一、生產時所費的必要勞動量常相等之商品是不存在的；第二、即使某種商品能滿足此種條件，但牠亦唯有對於同一條件生產的商品，始足成爲價值尺度，換言之，唯有當工資之騰貴，對於用爲價值尺度的商品和對牠相比較的商品，皆有同一的影響時，始爲可能。所以理論上所想像的完全的價值尺度是不存在的。

在現今資產階級的社會中，商品之交換價值，雖是稍有主要的變態，要皆決定於牠的勞動量。資本的積累雖對這基本公律有所改變，然而不能排除這種公律。不是工資和利潤決定商品的價值，

而是商品之價值決定工資和利潤。亞當斯密以爲地租可以使此種公律成爲無效，而華加圖在他有名的地租論中，則證明土地生產物的價格是決定於最劣等的土地，牠并不含有任何地租，因此，地租并不是土地生產物之構成要素。土地生產物，亦如其他商品一樣，其交換價值是依牠生產時所費的必需勞動爲決定標準的。土地生產物的價格高漲，便證明劣等土地因要滿足更大的需求而被開始耕種。劣等土地和上等土地的面積相等，投入的勞動量亦相等時，劣等地的生產物自較上等生產物爲少。換言之，劣等土地生產同量的生產物須消耗更多的勞動量。所以，土地生產物價格之高漲是地租盛行的原因，而非其結果。

李加圖的價格論是和亞當斯密一致的。他將凡是和所消費的勞動量相適合的價格稱之爲原來的或自然的價格；凡是與價格相差異的價格，則稱之爲現實的或市場的價格。價格搖擺不定或與自然價格相差異的原因，是因爲沒有一種商品的供給能長時間地適應於人類社會的需要。但價格亦不能永久維持在自然水平線之下或自然水平線之上，而其平均點則常使市場價格等於自然價格；這也可以這名爲一種求心力，這求心力便是資本家追求更高利潤之自然趨向。

李加圖學說的贊成派。

欲論李加圖學說的人是很多。如詹姆斯·彌爾 (James Mill 1773-1835)，他以爲資本不足以

決定生產物之交換價值。生產物相互交換的標準，最後是由勞動量決定的。資本在財貨生產中所應用的比例之不同，即牠所應用的積累勞動 (hoarded labour) 及直接勞動間之比例之不同，有着極其重要的關係。茲當分別下述三種情形來說：

- (一) 祇需要直接勞動而無需資本的生產物；
- (二) 半爲資本半爲直接勞動的生產物；
- (三) 祇應用資本即能獲得的生產物。

第(一)及第(三)兩項情形，實際上自然是沒存在的；然爲理論上明自計，則必須指出。今假設全部資本的中等構成是利第(三)項接近，即佔(一)(二)兩項情形之同等量。此時工資一有提高，利潤便當低降到工資所提高的百分數之一半。然而各種構成不同的資本，其因工資提高而受的影響極不一致。所以生產物在目前經濟生活中利潤率平均傾向佔優勢的情形之下，其交換價值應受工資提高的影響。即工資如提高，則全部第(一)項生產物的價值高漲，第(三)項生產物的價值按同一程度下降，而第(二)項生產物的價值則不變。然就各種商品的總體來說，是能保持不高漲不下降之平均狀態的。

麥鳩洛賓 (McCulloch, John Ramsay, 1779—1864) 也是附和這種意見的。他認爲「商品之交換價

值與牠原來的費用，或生產牠和運輸牠到市場時所必需的勞動量，成一正比例的公律，應用於某一特殊商品時，雖或不完全正確，但若應用於全體商品的總量上，則是絕對正確的。」但麥鳩洛克曾以需求是真實價值或交換價值之最後的源泉或原因。而當壟斷及供給和實際需求間的均衡如不存在時，則商品之交換價值當和牠的真實價值相一致。又資本家以資本或商品和勞動交換，他實際上是已使用過的勞動來交換準備使用的勞動。有時工人以整天將來的勞動祇換得一小時業已使用過的勞動之生產物；有時則十二小時的將來勞動可以受取十小時業已使用過的勞動之生產物。是資本家利潤之發生，乃由於資本家所支付的工資比工人所增加於生產物中的真實價值為小。所以工人的勞動有一部份時間是不能得到任何種的等價的。

恩恩(Thomas De Quincey 1785—1859)，也是擁護李加圖的見解的。他在『政治經濟之邏輯』一書中論價值時，提出了下列之圖解：

第一種關係：與『非價值』對立的價值，可以分為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

第二種關係：與『在交換中并無任何價格的純粹目的上之價值』對立的交換價值，可以分為使用價值（是價格之可能的基礎）與生產費價值（是價格之通常的基礎）。

他以為（一）與交換價值對立的使用價值和財富是相同的。這裏他稱讚李加圖能有此深刻的見

解。(二)第二種使用價值是肯定的價值，係根據有價值物品之內在的有用力——即使人力得藉以完成其某種目的之內在力——而產生的。這裏所謂『使用』，並不含有道德的意義，祇是指助成某種目的的一種力而言；其所欲助成的目的對於使用者是最不合理的，或是最有害的，那亦是『使用』之一種。固然，沒有使用價值便不能有交換價值，前者是後者之必要條件。但祇有使用價值是不能產生交換價值的；使用價值單獨決定交換價值的事例雖不是沒有，但是很少見的，而且祇有在反常的情形之下始有可能。在此種反常情形之下的物品價格，是決定於所需求的物品之作用。這在以前經濟學者所謂『壟斷價格』或『稀少價格』等情形之下，亦是如此。然而『壟斷』及『稀少』等情形實質上祇是交換價值之必要條件或消極條件，而不是牠的積極原因。物之肯定原因（即物之內在有用性）本是隱存着的，『壟斷』和『稀少』的情形不過是使這種隱存着的肯定原因表現出來而發生作用罷了。

在政治經濟學中，比使用價值更為重要的是另一種價值形態，即交換價值；此種交換價值不是一種理想的或正則的觀念，而是一種具體的或構成的觀念。峴息將交換價值分為下列兩種形式：

(一)由物品之使用價值決定者；

(二)由生產的艱難或勞苦決定者。

第二種情形佔百分之九十九。這並不是說，一種物品之內在效用性和生產的勞苦是不相容的；反之，每種商品中都包含這兩種成份。兩者都是交換價值所不可缺少的要素。但這兩個要素雖是同時存在，牠們對於價格的作用却是更番的；換言之，當一種要素發生作用時，另一種要素便隱而不現。效用性雖常在，但牠對於價格在「百次中都有九十九次不發生影響。嶼息把交換價值的這兩種形式稱之爲『肯定價值』(Affirmative)和『否定價值』(Negative)。前者是代表商品所有者因佔有該商品而得到的全部積極的利益和權力；後者是前者之對立物，代表佔有商品的全部阻礙力。前者之根源爲效用性，後者之根源爲生產費。在大多數情形之下，成爲價值根源的生產費是勞動量。生產過程之低廉須由於：第一、有了新發明，一部份勞動是減少了；第二、因某種廉價的工具或原料出現而排斥了其較貴者。所排斥的物品所以較貴的原因乃由於牠在生產時需要更多的勞動。

嶼息對利潤的見解和李加圖完全一致。生產物之價格分爲工資與利潤兩部份；利潤是超過工資的餘額。工資的變動和利潤的變動適成一反比例，而變動則必從工資開始。但他對於價格之由於供求關係所決定一點則表示反對。他以爲這是混同市場價格與事實價格所造成的錯誤的結果。爲要決定價格，我們必須加上生產費——這是主要的（常常是唯一的）因素。事實價格固常因供求關係或高或低於生產費，但當供求相等時，則等於生產費。而這却從並不是市場價格，乃是市場價格之對

立物——即亞丹斯密所謂的自然價格。

另有幾位學者則從李嘉圖的勞動價值學說中得到社會主義的結論。他們都生在馬克思以前，如多瑪·霍琪士金 (Thomas Hodgskin 1787—1863)，威廉·多姆生 (William Thompson 1785—1838)，約翰·格雷 (John Gray 1799—1850)，約翰·勃雷 (John Francis Bray 1809—1885) 四人可作代表。但他們都被稱為烏托邦派。

霍琪士金謂價值公律有二：一為自然公律，一為社會法則。前者和物價界的公律一樣，是長期的、不變的。後者則反是，其變動并無一定顯著的規則。科學應研究前者；對於後者的研究，唯有當牠和自然律發生矛盾的時候，此種情形在近代社會中正是如此。商品之交換價值或自然價格決定於生產商品時所必要的勞動量。但在現社會中，此種交換價值或自然價格却變成了社會價格。換言之，勞動者不能以他在生產某商品時所費之必要勞動量取得并購買該商品；反之，他之取得和購買該商品，須支出較多的勞動量。資本的私有，實際勞動者和資本的相隔離，是一切罪惡之源。資本是人類勞動之結果，就資本參加生產的情形來說，可分下列三種情形：

(一) 資本生產者及商品生產者為同一個人。在此種場合，勞動之全部生產物無須分割而屬於生產者自己。

(二) 資本生產者及商品生產者實際上是兩個人。在此種場合，勞動生產物平均分配於這兩個

八。

(三)資本爲不運用資本的、不生產的、階級中人之私有財產。在近代社會中，此種場合是一種常態。『工人在生產過程中生產或製造其他工人所應用的生產工具，並不是爲了使他們二者對於他們共同勞動所結合生產的生產物能夠得到正當公平的分配，而是爲了提取利潤，貢獻於第三者。』資本家只是生產工具的私有者，而不是實際勞動者。他並不參加生產。他之應用或出賃他自己的私有財產，其目的在得到工人產物的一部份。爲要使全部私有財產集中到他手中，他便竭力擴張他支配勞動生產物的權力，由此便防礙了生產及國民財富之進步。在此種情形之下，工人必須將其生產物的一部份與不生產的怠惰者分享，其結果是使這一部份的每年生產物，不能用於再生產。『一般利潤總數之增長是隨第三者積累資本於其手中之多寡爲比例，由此便發生了生產及人口發展的障礙。』至於工人生活則完全不能提高到安閑的程度，因爲爲他所生產的，除了其自己的生活需要外，皆爲資本家所掠奪。霍琪士金以爲，欲以利潤是忍欲、節儉及發展工業之必要的獎勵和刺激品的說法來證明資本所得的利潤爲正當，是不可能的。他十分深刻的指出此種說法是與『勞動的能力和技巧應與勞動的報酬成比例』的主張不相容。他說：『在利潤或利息的名義之下，將別人之生產物據爲己有之權利，是貪慾之獎勵品，這是我懂得的；但何以必須把工人的生產物分割與怠惰者以增殖

他的財富，方足以發展工業及增進社會的幸福，這却是我所不能明白的。」一切窮困，一切悲苦，一切現代社會所發生的現象，都是工人因自然律之破滅而獨負生產財物的責任的結果，都是工人須無報酬地以自己生產物之一部份送給那些只因擁有私權即能不勞而獲的資本家的結果。所以霍琪士金宣稱「一方面以爲近代財富分配法的各部份皆已明顯地破壞了『唯有勞動始能享受』的自然律，以爲他是藉武裝力量和法律而得以維持，而一方面仍謂之爲自然現象的那些經濟學家之主張，皆與彼相反。『我們所受的貧窮及悲苦，其發生并非由於自然界，而是由於某種社會制度，這種社會制度非但不能使工人發揮其生產力，并且還從他那裏掠奪了一部份的勞動生產物。』霍琪士金從歷史上看到，『凡以用不平的方法佔有他人勞動爲基礎的社會——例如希臘或羅馬國家是以奴隸爲基礎的——都是會滅亡的，由此認爲近代的平狀態亦必然地走向死亡之路。』（見所著 *Political Economy*）

多姆生亦持同一的見解。他著有『財富分配原理之研究』一書（一八七四年出版）。據他的說法，勞動是一切財富及交換價值之唯一源泉。『當我們估量某種使用貨財的價值時，實質上我們所估計的是製造牠時以及採取和製造原料時所消費的勞動。』

勞動既然創造一切財富與一切價值，所以唯有勞動者始有佔取全部生產物的權利。然而在現社

會中，勞動者并不具有此種權利，而一部份的生產物爲他人所強佔。多姆生由此更進而說明另一種社會，在這種社會中，任何人的勞動生產物，任何的勞動，皆不能無代價的從工人方面取去。他以爲這一種社會始能認爲滿意。唯有自願交與始爲正當，始爲合乎自然法則，且此原則亦首先應用在工人方面。

約翰·格雷亦承認，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中，所謂工人做工自由，只是一句空話。他大聲疾呼說：『沒有一種制度比強迫人類在公開競爭中出賣自己勞動的經濟制度更爲奇怪的了！』『我們只在名義上看見經濟制度是自由的，而實際上經濟制度是奴隸的。』他并不否認，在生產過程中，管理監督的勞動與通常勞動具有同一重要的作用，而近代社會中大多數的生產管理，皆由企業家實行。然而這種管理者的工資雖是很高，亦應當有一固定的數目，與通常勞動相較，亦應有一確定的比例。除了此種生產管理者的報酬以外，工人應得全部勞動生產物。所以格雷提出了按勞動結果來發工資的公律，并主張儘量減少不生產勞動的報酬。一般經濟學者所謂的工資之天然水平綫，是指那些最下等工人維持生活及繁殖所必需的最低數目。『我的說法，則和他們相反，工資的天然水平，除了上述的報酬以外，是勞動生產物之全部。』（見所著 *The Social Systems: A Treatise of The*

Principle of Exchange 1831)

約翰·勃雷也從李加圖的學說中得到社會主義的結論。他說：『每個人對於他自己的勞動所能創造的一切東西，都有絕對的權利。他佔取他自己勞動的產物是極其正當的，因為他并不侵害他人，并未剝削他人的此種權利。』現時此種倫理上的道理，因為財產之不公平及工人與資本家間之對立而不存在了；永遠以同等的價值相交換為最高的公理，然而現時因資本家私有了一切資本之故，都只以工資形式給與工人在生產物上所創造的價值之一部份。『工人及資本家間之同意，實在是滑稽之談；實際上在百分之百的場合中，所謂同意也者，縱令是合法的，亦不過是一種最無恥的掠奪而已。』到了社會劃分成為資本家及生產者兩階級時，生產者以自己勞動來生活，而資本家則以生產者勞動所得來的利潤以自肥，交換就不平等了，而企業家的利潤，則常是從勞動者應得之全部勞動生產物中扣除出來的。因此現存的私有制度是一切社會上不平等之原因，應當根本推翻。勃雷以為必須有一種發展到完全的共產主義經濟制度之過渡階段以代替現存的社會，使交換及勞動得以平等；此時富之取得，唯有依靠勞動，而利潤及利息皆永告死亡。（見所著 *Labour's Wrongs and Labour's Remedy* 1839）

李加圖學說的反對派

還有幾位反對李加圖學說的人也應在此一提。如勞勃·多倫 (*Robert Torrens* 1780—1864) 在所著

『財富生產論』中（一八二二年出版），首先在原則上反對李加圖，他開始研究富，及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定義。富是有用於人類的，爲人類所希冀的，而且需要某種程度的勞動或有用的努力而保存和製造的物品之總量。使用價值是每種有用物品所具有的。交換價值是以社會形式爲依歸的，牠只有在交換經濟中始能出現；在純粹的自然經濟中，交換價值是不存在的。因此，富既不是由使用價值所構成，因爲就是不加勞動的物品，亦具有使用價值；也不是由交換價值所構成，因爲富即使沒有交換價值亦是可能的。交換價值是財富之偶然的、能有也能無的性質。……到了近代，支配商品交換的公律是：所消費的資本相等者，卽具有同等的價值，因爲競爭迫使每個資本家不得不以此爲計算的基礎。不管是相等的累積勞動量所吸引的直接勞動量如何不同，或是同量的資本之耐久力如何不等，對於上述的公律都不成有所例外。多倫將資本的利潤看爲一成不變，已經確立無須說明的東西。資本的利潤并不包含在生產費以內。資本之利潤是由資本消耗中所得到的新東西。但多倫對於利潤究竟如何生產出來，則未說及。

攻擊李加圖更兇的還有薩米爾·貝萊（Samuel Bailey 1791—1860）。他的主要著作是『論價值之性質與尺度及其原因』。貝萊以爲價值并不是屬於某一物品之單純的價值，而是兩種或數種互相交換的物品之比較或關係。他以爲亞丹斯密的定義說，價值是『某物所具有的獲得他物之能力』，是完全正確的。價值，就牠的實質說，是相對的東西；牠絕不是肯定的或內在的，而祇是兩物間相互

的交換關係。他指摘李加圖常使價值從外在的相對的東西，變成內在的絕對的東西。他更說，「勞動這個東西，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不能用爲價值之實際尺度。因爲不論那一種商品都不能明白說牠究竟值得多少勞動。所以這是沒有意義的。」

至於價值原因之研究，據貝萊的意見，「是在於探究生活必需品、效用品及娛樂品相交換時那些對於人們精神上有固定影響、使人們能加以考察和計算之實際的外在條件。此種條件對於人們精神之影響；或是爲他的動機上之影響，換言之，即對於他的見解之直接影響；或是間接地引起此類動機。然而不論其影響之情形如何，一旦此等條件發生固定作用，則應視爲價值的原因。」其足以使各種商品以一定量相交換的原因，則宜將商品分爲三種範疇加以研究：（一）屬於壟斷的商品，則視購買者對該商品的評價，及壟斷者彼此間的競爭結果及其可能供給的利潤以進行生產和交換。（二）可以隨生產費之固定增長而增加的商品，如麵包、原料、石炭等，則其價值原因爲供求關係或購買者間之競爭。在這裏，生產費祇是調節價值而不創造價值。（三）在無限制競爭下生產的商品。此時，因無壟斷，故其交換關係是以生產費爲決定標準。凡不用資本而由工人生產者則僅由所消費的勞動決定；其用資本而由資本家生產者，則僅由所消費的資本決定。貝萊以爲可以把某種物品作爲決定他種物品的最近原因，雖然還有第三種物品（勞動）或可作爲同一物品的價值較遠原因。所以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統治之下，資本的費用是主要的——雖然不是唯一的——價值原因。

李加圖以爲工資騰貴，利潤必隨之下降。但若以爲勞動價值係指勞動者的生活資料的價值而言，則在勞動生產力進步的情形之下，勞動價值可以不變，甚至增高，而同時利潤非但不下降，并且亦增長，據貝萊的意見，以爲李加圖的學說，只有在假定勞動生產力不變的情形之下，始可適用。

還有多瑪·勞勃·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威廉·愛金生(William Atkinson)和亨利·鄧蒂·麥克利昂(Henry Dunning Maclellan 1821—1906)也反對李加圖。但他們的觀點和多倫與貝萊的不同。他們以爲支配價值的原則，不是勞動量，也不是生產費，而是供求的關係。

馬爾薩斯以爲供求關係不應被視爲純粹的數量關係。所謂實際需求及實際供求的說法，亦有缺點。反之，需求的強度是絕對的因素。如需求的人數加倍，或商品的供給減半，此時商品的價格唯在那和以前數量相同的購買者準備支付更高的價格時(即需求強度增大時)始能提高。在相反的情形下，則唯有需求強度降低時，商品的價格始能低廉。他以爲生產費在價格形成中，只有副作用。

愛金生則以爲在自然經濟統治下的原始時代，交換價值是談不上；交換價值唯有了以一定

分工爲基礎，人對各個別生產物發生需求的時候。因此，一切價值的原因是需求，其他的原因是不存在的。一切商品價值之變遷，實質上是供求關係的變遷之結果。假若沒有需求，則必無價值。需求增長，而供給不隨之俱增，其結果必使價值提高；需求減少，供給不變，其結果爲價值減低。勞動是創造一切商品的工具，以之作爲具有社會的根源，作爲唯有在人的相互關係中始能發生交換價值的因素，是錯誤的。

麥克利昂的基本理論出發點在：經濟學之任務，不在於研究物品之效用的及娛樂的性質，而祇是在研究牠與他種物品之外在關係。而唯一足爲真正經濟學者研究的物品性質，是牠們的可交換性。交換價值的性質是相對的，外在的，不是內在的。若某一物品甚麼東西也交換不到，那末，牠可以說是沒有一點價值。因此，價值應當視爲特定社會狀態的結果。凡主張勞動爲一切價值的原因者，當得以下的幾個結論：

(一)一切價值的變遷應依於勞動量的變遷。然而有許多物質的物品，雖未應用勞動，亦有價值，例如城市中的土地，特別是在近代大城市中，因人口之集中，一部份土地有極大的價值。炭鑛鐵鑛雖未經人開採，亦具有極高的價值。牲畜亦如是。

(二)消耗同一勞動量生產的物品，應有同一的價值。那末，眞珠及介殼亦應有同一的價值。

(三)價值應與勞動成比例。由此說來，經過長期而始獲得的金鑽，比偶然獲得的金鑽，其價值當高過很多了。然而世界還沒有這麼一回事。

(四)凡為勞動所生產的物品應永遠具有價值，而且具有同一的價值。然而事實上物品在此處具有價值，在別處却沒有價值，在此時具有價值，在彼一時又沒有價值。

『總而言之，在科學中，從來沒有一種學說比「以勞動為價值的原因」之說遭受更大的失敗了。』(見所著 *The Elements of Economics*)

還有一位威廉·賡索·西尼爾(*William Nassau Senior 1790—1864*)，也操同一論調。他以為價值是一種相互存在於兩件物品之間的關係。牠所表示的正確關係是：一定量的某種物品在交換中能取得之一定量的他種物品。價值之條件或要素有三：(一)效用性；(二)供給有限性；(三)可轉讓性。據他的意見，供給有限性是價值之最重要的條件。祇有在完全的自由競爭之下，生產費才是價值之支配者。生產費是由生產所必需的積累勞動和直接勞動，加上此全部消耗量之利息(牠與通常利潤相等)所匯合而成。簡言之，生產費是生產所必需的勞動與「忍欲」之總和。利潤是資商家「忍欲」之成果及「忍欲」所得的報酬。資本之成為生產因素，亦和勞動及自然力之成為生產因素一樣；牠對利潤的關係，亦和勞動對工資的關係具有同等意義。「如果祇應用一種勞動，則價格應等

於工資。若此等勞動尙須忍欲來加以完成，換言之，如果在僱用勞動到出賣生產物的中間，尙須經過若干的時間，則價格應等於勞動的工資和一種特殊的報酬之總和。此種特殊的報酬可以付給工人（如果他願意延期取得工資），亦可付給資本公司（如果他預先發給工資）。『這就是說：因為資本家在生產期內所支付的資本并非爲了自己個人的目的，所以他對此『忍欲』，應取得報酬；此種報酬便是利潤。』（見所著 *An Outline of Political Economy* 1839）

調和派（約翰·斯圖亞特·彌爾）

約翰·斯圖亞特·彌爾（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可以作爲李嘉圖贊成派與反對派的調和論者的代表。彌爾以爲，凡是應用勞動和費用即可增加其供給數量的商品，其供給之能否繼續地無限增加，須視其價值是否足以償付牠的生產費和資本之普通利潤。生產費加上普通利潤，是一切由勞動和資本所生產的物品之必要價格或價值。此項必要價格，在自由競爭的情形之下，是最低的價值，同時，亦是最高的價值。所以物品之相互交換，通常是以其價值足供每一生產者除收回其生產費外，還能取得普通利潤爲準則的。此種生產費所由構成的最主要的、而且差不多是唯一的要素，是勞動。生產某一物品時所消耗的勞動，便該是物品生產者的成本。然而如果我們認墊付工資的資本公司爲生產者，則生產費可以說是由工資所構成的了，因為資本公司所花費的，歸根結底全是工資。

因此商品之價值雖主要是決定於生產該商品時所必要的勞動量，勞動量雖是價值變動的主要原因，但生產費在資本家看來，祇是勞動的工資，而不是勞動的數量，前者是可變的，而後者是不變的，所以商品之價值不能單獨決定於勞動量，而是決定於勞動量及其報酬。

彌爾以爲勞動品質之不同實際上對於價值的影響是很大的。例如，精練勞動之產物可以換取較大量的粗工之產物，這是因爲前者之工資較後者爲高之故。一旦教育普及，精練勞動的工資必定下降，而此時，其生產所必需的勞動量雖無變動，其價值比較起來，却是減低了。

利潤率的不同和工資高低一樣，對於商品之交換價值亦有影響。從事於危險的、困難的、和不愉快的職業的人，應取得相當的報酬；但此種報酬，祇有使商品的出賣價值高於生產該商品時所必要的勞動量的價值，方能取得。他和多倫的意見相同，并不把利潤包括在生產費以內，但他又同意西尼爾之說，以爲利潤是『忍欲』的報酬。資本之總收入應當足以支付忍欲、冒險、及管理勞動之報酬。

然則利潤量的原因是甚麼呢？據流行的見解，利潤好像是決定於價格的；資本家之取得利潤好像是以因爲他比商品所值的更大價值出賣的緣故。由此說來，利潤是買賣的結果了。『然而這祇觀察到社會經濟構造的表面。』『利潤的原因是，勞動所生產的超過維持勞動所必要的費用……資

本所以能生產利潤的，是因爲衣、食、原料、工具等的耐久力比生產牠們所必要的時間來得長，所以如果資本家以取得工人全部的勞動生產物爲條件，而以此等物品（衣、食、原料、工具等）供給若干工人，那這些工人除了再生產他們自己所需要的的生活資料和工具外，還有一部份多餘的時間爲資本家工作……如果一國工人的生產總量，除了他們的工資外，尚有百分之二十的多餘，則利潤便是百分之二十。『這裏顯然有着『剩餘價值論』的萌芽。

除生產費外，供求的關係對於價值之建立，亦發生作用，特別是對供給絕對有限的商品。此等商品之稀少性所能具有的價值，仍是以供求爲基礎。自然價值與實際價值之間的差異，係由商品之供給的數量與商品之有效需求之間的某種不吻合而發生的。但供求之不吻合，祇是使商品價值隨而增長或隨而下降的過程中之短促的過渡而已，並不是永存的。所以即在商品之供給絕對有限的場合之下，供求間之比率這一概念是不存在的，所存在的是供求之均衡的概念。在任何時候，供求如果不相等，則競爭會使牠趨於相等，而是藉價值之變遷而發生的。彌爾是以此等結論來改變以前各種供求的學說，他以爲供求的平等，即在商品價格比生產費價格更高的情形之下，亦能存在；以前的學說，則以爲在此等情形之下，供求的關係是不平等的。（見所著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四、馬克思主義的價值理論

馬克思(1818—1883)的分析是以資本主義時代的商品經濟爲出發點，運用辯證的方法，對於價值問題在以自諸家學說中所發生的矛盾之處加以澄清，其功績誠不可磨滅。馬克思所生的時代，在西歐工業資本主義在其發展的過程中，正暴露着矛盾的時期。他將這些矛盾一一施以解剖，得到『剩餘價值論』這個時代的結論，藉以喚起資本主義國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歷史的發展雖未如所期（照馬克思的理論，無產階級的革命應首先在英國出現），而恩格斯、列甯在繼承其系統的理论作爲行動以鬥爭，卒使沙皇統治的俄帝國變成了第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俄國革命固有其特殊的因素，如民族壓迫、農民和小有產者之被剝削、國際金融資本之統治等，然十月革命則確爲工人所領導而成功。蘇聯之建國基礎亦在於對勞動階層之保障。

馬克思的深刻的研究在置全部經濟學體系於勞動價值學說的基礎之上。他綜合了以前各家對於勞動價值說認爲正確的部份，而解答了他們的紛爭。他從分析商品出發，他以爲商品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最佔優勢的社會中之財富的基本形態』。『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所支配着的社會財富，表現爲『商品的大量堆積』。』馬克思的資本論即以這樣一句話來開始。商品是出賣的東西，同時又

是因其具有能以滿足人類生活上的或種需要才能出賣。商品能出賣是說牠能交換別的東西；經濟學上名之爲具有交換價值；商品能滿足人類的需要是有用，經濟學上名之爲具有使用價值。空氣和日光具有使用價值，但不能交換，所以不能成爲商品；可是商品則都必須具有使用價值，沒有用的東西是沒有人來買的。

各種物品之互相交換是因爲其中含有一種共同的性質，這種共同的性質便是由於牠們都是勞動生產品。商品是勞動生產品這一事實，遂使牠們成爲具有價值。商品的價值在商品的交換關係中才能表現出來。在交換過程中，人類便含在各種不同的商品中裏面的各種各樣的勞動相等起來。在一切商品中所具有的那種共同性，是人類一般的勞動，馬克思名之曰「抽象勞動」。抽象勞動是指一般的勞動而言。農夫的勞動、裁縫的勞動、鞋匠的勞動、車夫的勞動、泥瓦匠的勞動……各別的說起來，他們的勞動都是「具體的勞動」。具體勞動產生使用價值，如鞋匠的勞動產生鞋子……；抽象的勞動則產生價值。價值則用交換價值表現出來。

一件有用的東西，祇因爲在牠裏面包含着一般的人類勞動——抽象勞動——之故，所以才具有價值。這個價值之大小是由包含在牠裏面的形成價值的實體，即勞動之份量來測定的。而勞動之份量則以勞動之時間（幾時、幾日、幾月等）爲尺度。但虛耗的勞動不能算作價值。算作價值的只是生產

所通常必需的勞動份量。馬克思說：「形成價值之實體的勞動，是同樣的人類勞動，換言之，是同一的人類勞動力之支出。在商品世界的價值總和裏所表現的社會之總勞動力，雖由無數個別勞動力所成立的，但在這裏，却被看作一筆完全一樣的人類勞動力。這些個別的勞動力之每一個，只要其具有社會的平均勞動的性質，並且當作這樣的社會的平均勞動力而發生作用，換言之，祇要在一商品的生產上，僅需要平均的勞動時間或「社會的必需勞動時間」，那他就和其他個別的勞動力一樣，都是同一的人類勞動力。所謂「社會的必需勞動時間」，就是在現存的社會的和正常的生產條件之下，用勞動之熟練及強度之社會的平均程度，生產一種使用價值所必需的勞動時間。」（見資本論第一章第一節）

在這裏，馬克思科學地解答了各種不同勞動產生不同價值的爭論，而且開始解決了價值的尺度的問題。

在工業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商品統治着生產。一切生產品幾乎都是爲了出賣。棺材店的老闆製了若干具棺材決不是爲了自用的。麵粉廠的主人和紗布紡織廠的主人僱用成千百的工人生產着大量的麵粉和棉紗布疋，亦不是爲了自食自衣。所以商品的生產是爲了交換。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體系，應研究交換價值。

我們知道，商品的價值是由對牠在生產時所支出的勞動創造出來，商品的價值不外是凝結在其中的（或是在其中物象化了的）一定數量的勞動時間。然而價值却只有在一種商品與別種商品的比較中才能表現出來。用與別種商品比較的方法所表現出來的商品價值，是牠們的交換價值。價值只有在交換價值的形式中才能表現出來。所以交換價值，是價值的表現形態。馬克思把此等形態分為四種，而每種形態都是代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之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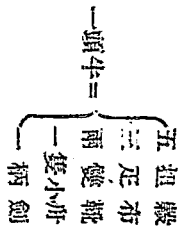
（一）單純的價值形態。在原始時代，交換只是偶然的進行的時候，是一種商品和別種商品來交換。比如說，一張獸皮交換兩張弓。在這種場合，獸皮的價值是在兩張弓的效用價值中取得了自己的表現。兩張弓是表現等於一張獸皮之特定量的價值的。這是第一種價值形態；在歷史上，便是屬於商品生產的萌芽時期。

在單純的價值形態中，已經有了等價物機能的商品的特徵，一種商品的使用價值是用做自己的對立物——價值——的表現。所以，具體勞動在這裏是用做抽象勞動的表現，私人的勞動是用做社會勞動的表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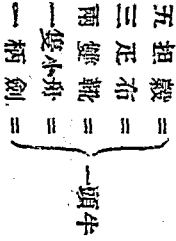
（二）擴大的價值形態。交換漸漸的發展起來，就不僅是兩種商品偶然的相互交換而是一種商品能交換若干種其他的商品了。例如同是一張獸皮，不僅能交換兩張弓，而且也能交換一袋穀、一

片布、一雙靴子，或一隻籠。此時價值的相對形態從一種商品中表現出來，而其他無數商品則都表現為等價形態。這裏，一種商品的價值是表現在其他若干種的商品中；各個其他的商品體都變成反映了反映獸皮價值的鏡子。價值與使用價值的分裂，這裏更顯著的表現了出來。

(三) 一般的價值形態。這種價值形態是將各種商品之價值都表現在一種特定的商品中；此時唯一一種商品是等價形態，而其餘的則是相對的價值形態。擴大的價值形態下，交換公式為：



在一般價值形態下，就成了：



在一般的價值形態下，一切商品都在同一的商品中來表現自己的價值。用以表現其他商品價值的商品，是用做一般的等價物。這種商品能夠隨便拿來和任何商品交換。祇有這種形態才開始有效地把諸商品當作價值而使牠們發生相互的關係，且使諸商品互相表示為交換價值。在這種價值形態中，勞動生產物被表示為無差別的人類勞動之產物。價值與使用價值的分離，在這裏走得更遠。

(四) 貨幣的價值形態。貨幣的價值形態和一般的價值形態很少區別。當貴金屬——金和銀——因少具有特殊的物理的屬性（不起銹、不易變更形式、便於攜帶……）堅定的成為一般的等價物的時候，我們是由一般的價值形態轉到了貨幣的價值形態。在貨幣價值形態中，一定的社會機能——表現一切商品價值的任務——堅定的與一種一定的商品結合着。這種商品——金或銀——遂徹底的由商品世界中分離出來。在成為貨幣以前，黃金當然是商品；但成了貨幣，黃金遂獲得許多與牠的貨幣機能有關聯的新屬性了。貨幣成為唯一的及一般的表現價值的手段。其他的一切商品都當作使用價值，和貨幣對立起來。貨幣成了價值的代表，價值的尺度也由貨幣來表現。

在近代國民經濟中，一切交換都經過貨幣而進行，商品流通的直接形態為：

商品——貨幣——商品。

即是爲購買別種才出賣這一商品。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商品的流通形態，通常是：

貨幣——商品——貨幣。

卽由貨幣轉化爲商品，由商品再轉化爲貨幣，其目的在爲賣而買。在爲買而賣的商品交換形態下，貨幣起作媒介的中間作用，目的也是很顯明的。靴匠出賣之靴子，買進來麵包，是一種使用價值交換別一種使用價值，交換循環的目的是消費。在爲賣而買的交流形態下，結果是由貨幣出發最後仍是得到貨幣。倘使前後兩者的貨幣價值是相等的，這種的流通將失去其意義。所以此種形態唯有變爲：貨幣——商品——貨幣+（貨幣）時，始發生意義。換言之，投入流通中的貨幣是用以取得更多的貨幣，或一般的說，價值之墊付，其目的是在取得更多的價值。此種形態便是資本形態。更多的貨幣便成了資本的利潤。馬克思對利潤的來源解釋爲「剩餘價值」。

利潤，或卽剩餘價值，從那裏來的呢？

顯然，帶着貨幣進入市場的資本家，必須尋找特種商品。這種商品，必須在使用牠的時候，能具有產生比牠自己的價值更高的價值的來源。照這種商品，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是實際存在着。這種商品便是勞動力。勞動力或勞動能力，是存在於活人身上有機體中的肉體的及精神的諸能力之

總和。當其生產或種使用價值的時候，是把他們在多次運動中來引用的。出賣勞動力於資本家的，即為衆多的勞動者——工人。

在商品經濟中，商品按照自己的價格來發賣。價值由對於生產商品所必需的勞動數量來決定，工人所出賣的那種商品、勞動者，其價值又是怎樣呢？

為要勞動，人人必須維持自己的生活：要吃、要穿、並要有睡覺的地方。只有當人滿足了自己每日最低限度的需要的時候，他才有勞動能力。因此滿足工人每日的需要，這就是勞動力的生產。

「勞動力的價值，是對於維持牠的所有者的生命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勞動力在這般價值下出賣時，却并不足以妨礙其在活動的過程中產生出比自己價值更大的勞動生產物的價值。

我們假定不勞動者每天平均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為六小時社會的必需勞動，那麼，勞動力一天的價值便是由這六小時社會必需勞動來決定的。假如這六小時的勞動可以用一元錢來表現，則一元錢便等於勞動力一天價值的價格。倘若資本家以一元錢一天的價格買這勞動力，而把牠在生產中使用了十二小時，則牠除了再生產出牠自己的等價物外，還生產出六小時「超額價值」來，這種超額價值就是「剩餘價值」。換言之，這裏有六小時是剩餘勞動，而此六小時的剩餘勞動產生了「剩餘價值」（剩餘價值是對象化了的剩餘勞動），是超過勞動力本身所具有的價值以上的價值。

「轉化爲生產工具」，份資本，換言之，轉化爲原料，助成材料，和勞動要具的那部份資本，在生產過程中，并不變更其價值之大小。因此，我稱他爲資本之不變部份，或簡稱之爲「不變資本」。反之、轉化爲勞動力的那部份資本，在生產過程中，却變化其價值。他既再生了其自己的等價物，又生產出一個超過額的剩餘價值；這個剩餘價值的數量是變化的，是可以變大或變小的。這部份資本不斷的由不變量轉化爲可變量。因此，我稱他爲資本之可變部份，或簡那爲「可變資本」。資本之同一的構成物，從勞動過程的立場看來，可分爲客觀的和主觀的兩因素——可分爲生產工具和勞動力；從創造剩餘價值過程的立場看來，便可分爲「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可變資本」之價值之相對的增殖，換言之，剩餘價值之相對量，就名之爲剩餘價值率」。（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篇第六章）

此種「剩餘價值率」一方面是依存於「剩餘價值」的份量，他方面則依存於可變資本的份量。由此必須將「絕對的剩餘價值」及「相對的剩餘價值」加以分別。凡是在勞動力價值不變情形之下，延長工作時間而產生的「剩餘價值」，是「絕對的剩餘的價值」；凡是在勞動時間不變情形之下，降低勞動力的價值（減工資）而得的「剩餘價值」，是爲「相對的剩餘價值」。「剩餘價值率」或剝削率之所以能夠提高，如不是因爲工作時間的延長，便是因爲勞動力價值的降低。

『剩餘價值』是僱傭勞動在生產過程中生產超過勞動價值以上的價值，所以只有對資本家所墊付的『可變資本』有關係。若以為『剩餘價值』是與資本家投入流通中的全部資本都有關係，則牠便成爲利潤。全部資本增殖的程度，是表現在利潤率中：

剩餘價值

不變資本 + 可變資本 = 利潤率

然而此種利潤率在資本主義生產中亦具有決定的作用，因為每個資本家皆欲實現，且在實際上實現着適應於他的全部資本之利潤。此種事實，成爲價值破壞最主要的原因。因爲（一）『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常有着極不相同的有機構成；（二）『不變資本』流通的期間亦極不一致；（三）商品資本流通時期更不盡相同。

馬克思以爲資本家便在獲取利潤的掩蔽下進行其對工人羣衆的殘酷的剝削，使得大家的財富聚集到少數的資本家手中，而工人乃變成一無所有。

無論是地主的地租、借貸資本的利息、股東的花紅、商人的利潤、一切的賄賂費用，……總之，各種各樣的非由勞動生產所得來的價值都來自『剩餘價值』。除『剩餘價值』外，沒有別的來源。

於是這些不勞動的剝削者構成一個階級，那些被剝削者構成一個階級。在最初，被剝削者因為無力反抗，不得不甘受剝削；到了後來，工業愈發達，工人都集中在工業區，有了階級思想的傳播，即開始組織團體，進行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初行要求增加工資，減少工作時間，繼則進而作奪取政權的準備，謀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權，以實現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共產社會。

到了馬克思，根據他的價值理論，喚起了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開始以一種國際的規模建立反對資產階級統治的機構，訓練各資本主義國的共產黨員進行猛烈的階級鬥爭。於是，社會主義便由一種空想的烏托邦被稱為科學的了。

馬克思根據着英國古典派的經濟學理論，德國黑格爾哲學的系統，法國社會主義思想及巴黎公社實際鬥爭的經驗、達爾文的生物學，以及亞歐諸國科學家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方面自十七世紀以來的進步，加以檢討，加以聯繫，構成了馬克思主義整個的體系。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歐洲「社會的」性質。

馬克思曾於資本主義的「社會」的性質，對於價值學說已開始着重其社會意義的研究。本來「價值是一種社會關係」的說法，在馬克思以前就有人說過，但他們（如麥克利昂等）將價值之所由

產生的內在原因（勞動力的工作）這一點也完全否認。馬克思則首先將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分別開來，指出具體勞動所產生的為使用價值，抽象勞動所生產的是價值，價值藉交換以表現出來，成為交換價值，從而認識「價值是社會關係」。

馬克思從分析商品交換來開始，從這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的人與人間的日常的、最普遍而平凡的關係，經過物的交換所表現出來的人與人的社會關係，暴露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矛盾。

商品的價值并不是商品的一種自然性質，而是一種社會關係。在商品生產下，人與人間對生產的關係，是採取物與物間的外貌。商品因而獲得其特殊的屬性——社會關係的屬性。在資本主義的時代，社會裏人與人的一切生產關係，是被物的生產與交換之進行包蔽了的。人與人間的一切生產關係是在物與物間的關係的形式中表現出來。

在馬克思以前，各家研究經濟學者，對於價值這一不可理解的東西都嘗盡力加以研究，從多方面解釋物件價值的來源及其表現。李加圖的功績，尤屬不可磨滅。但他們迄未建立一個整個社會關係的系統。到了馬克思，才從分析勞動價值論達到社會主義的結論。從而馬克思才能使「現在研究社會的人，沒有那一個不是崇拜馬克思為社會主義中的聖人。」「從馬克思以後，社會主義裏頭便分兩派：一個是烏托邦派，一個是科學派。」「馬克思所求出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就是科學的社

會主義」

孫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中，這樣指出了馬克思在世界社會主義者中間的崇高地位以後，進而批評馬克思「物質是歷史的重心」和「盈餘價值論」的理論。指出「民生是歷史的重心」，和價值是社會的構成。孫中山先生的批評，暴露出了馬克思理論的美中不足來。

五、馬克思主義的批判

社會關係的表現與實質

馬克思的成功在將價值置於社會關係的基礎之上。但他雖然說明了這種關係是人與人間的關係，由物的生產和交換關係表現出來，而他却又將歷史的重心釘在人與人間的社會表現形式上——生產關係上，而不直說其實際的內容。物的生產與交換之進行爲了甚麼呢？爲了吃，爲了穿，爲了住，爲了行，……爲了一切人類生活上的必需。生產力之進步是爲了解決生活上的困難問題。歷史以社會進化爲重心，社會進化又以民生爲重心。所以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物的關係下面隱藏着人與人間的關係。人的生活關係藉物的生產關係表現出來。歷史是人類生活的歷史，不是物的關係的歷史。人類的生活雖不能離開了物質，可是那些未能參加人類生活的物質是走不進人類生活

的歷史來的。物的關係演變了人類生活的歷史，但物的關係并不等於人類生活的歷史。

資本主義社會以及以前各種社會裏面所存在的剝削關係，那是社會關係中的病態。社會的動亂即由這種病態所產生。所以馬克思是病理學家，而不是生理學家。作者已蒐集了一些材料從生理學上來說明這些情形。同若干富有學問的醫學者的談話中，已足證明 孫中山先生理論對馬克思主義的優越的正確性。

使用價值的社會性

價值不僅在交換上是表現為一種社會關係，根本在使用價值上便是隨社會的發展而變更的。許多看起來於人生沒有關係的草，經神農試嘗了以後，漸漸便成為有價值的藥品了。空氣中所含五分之四的窒氣，從來沒有人把牠當作有用的東西，經科學的進步，可以用來製火藥，也可以用來製肥料。含在普通石頭中的鋁，現在用來做食器等，但數十年前，估價却高於白銀八倍至十倍。因為電力技術的進步，很容易的使牠純化了起來，市場價格跌了一千倍，但市場却廣泛起來了。從雜草和廢物中提取有用品的工業在產業革命先進國正廣泛的進行。

但這些價值之產生，我們都不說是那一個人或那一羣人單獨的力量。我們聽到許多醫藥的故事，若干藥品的發現，是由於發現獸類，尤其是猿猴類，用來作藥才知道的。中國古代人民不知道利

用若干普通的草木作為藥品，已不知犧牲了若干萬人的生命，才迫使神農犧牲自己去嘗藥以救人。神農的功績固不可磨滅，但當神農以前，已不知有若干嘗藥和害病的犧牲者。

剝削關係之演進

剝削關係之存在，在歷史上確為最重要的關係。但這是人與人的關係，不是物與物的關係，有許多人一生全部的精力都被剝削了去。幾幾乎對人類全體生活維護有過貢獻的人，都是被剝削者。問題是在剝削者只是少數人，而被剝削者却一代比一代增加其數量。到了帝國主義時代，剝削者祇是帝國主義的統治階級，而被剝削者則為十餘萬萬弱小民族以及勞動者了。

到了帝國主義的時代，我們已經可以很清楚的看出，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不足以說明事實的真理。機器生產力之擴大減少了人工，問題不在生產不足，而在消費不得平均。帝國主義國內的統治階層不難對其國內一部份的勞動者付足了所應付的勞動價值，即謂帝國主義國內的勞動者祇要失業，已得到了因支付其勞動力而交換得來的應有的足供消費的代價，有時且超過之。美國的工資水準超過任何其他國家，即其明證。（平均美國工資約為英國倫敦工資的兩倍半，印度工資為英國工資七分之一，中國工資為印度工資二分之一）而若干勞動運動者反從統治者手中得到若干額外的津貼，造成了『工人貴族』的階層。大多數的知識勞動份子，如自由職業者們，大都能從帝國主義

的剝削關係中分潤若干餽餘，以維持其高貴的生活。失業者和殖民地人民才是真正的被剝削者。英國貴遠社理論家柯爾（Cole）在其所著『馬克思之真諦』中，極力說明英國中層階級之存在，乃因確有此一事實（參讀拙譯馬克思之真諦，中山文庫，商務出版）。這并非柯爾歪曲了馬克思主義，而是英國社會在二十世紀的狀況并不如馬克思之所預期。在這裏，我們不難因此而瞭解以馬克思主義正統派自居的考茨基所以終於成爲列寧心目中的『叛徒』，以及第二國際諸領袖們，當一九一四年大戰發生以後，大家都喊出『爲祖國而戰』的口號來的原因了。英國二黨的政治綱領，擁護帝國主義地盤和政策的政治綱領，雖在共產黨猛烈抨擊之下，仍然在英國工人羣衆中起着重大的作用，也就是這個原因。

英美諸帝國主義國內的工人，惟有在失業狂潮襲擊的時候，在帝國主義戰爭失敗的時候，在殖民地革命運動廣泛的蓬勃興起的時候，才有對他們『賢明的』統治者發生革命的可能。

戰時與平時的『超額利潤』

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不僅不足以說明帝國主義國家的統制階層龐大利潤的來源，在戰爭發生的時候，奸商由囤積居奇所造成的人爲的供求不平衡，從物價飛漲中所擷取的高厚的利潤的來源，也非『剩餘價值論』所可能擬議。最近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權威瓦爾加在所著『兩種制度』一

書中，想由創立一個新名詞『價格革命』，來彌補馬克思主義在這裏顯出的一個大漏洞，但這是徒勞無功的。他以為戰時物價，當其超過平時物價在價值水準週圍搖擺的程度而一直上漲時，『商品的需求經常超出於供給。由於勞力、原料和固定資本的缺乏，供給常落在需求之後。因此資本主義的常態機構不發生作用。……價格革命就開始了。』（祝百美譯本一六一頁）瓦爾加雖分析了這一事實，但沒有說明這種『超額利潤』的來源。照這種說法，勢必回到『價值是經供求關係所產生』的理論了。事實上，生產資本所囊括的這種『超額利潤』，『遠過於其所佔有的剩餘價值之上』的『超額利潤』，在資本主義制度形成的開始就一直存在着的，特馬克思因強調其『剩餘勞動論』，未經見及就是了。這種『超額利潤』到了帝國主義時代的剝削關係下，就已經很清楚的顯現了出來。戰事發生，更暴露得人人都看見了，成了資產階級人人想追求的東西。瓦爾加『價格革命』的說法，是非常牽強不符事實的理論。

一片不動的荒地，如那個澳洲醉漢所拍賣的，一旦因世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澳洲成了世界資本主義的一環，經十餘年，若干人在其週圍發達了工商業以後，即可獲得千萬倍的利潤。足見馬克思所謂『不變』資本也者，並不是真正的不變。

『而美國福特工廠在短縮工時，增加工資的情況下進行生產，反能得到更多的利潤；足見『剩餘

價值」之「絕對」性與「相對」性之不符事實。在這裏，馬克思主義者的答覆是勞動強度和勞動生產性提高了，但如沒有社會價值供剝削，利潤額是不能增多至千萬倍的。

六、社會價值論簡說

對於社會價值論的科學的基礎，作者擬先在這裏作一個初步的簡單而草率的建立。自尙有待於繼續的研究。

爲消費而生產

「剩餘價值論」的一個最顯見的缺點在僅說及了生產的過程，而未說及消費的過程。這也同時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所產生的主要矛盾之一。統濟恐慌之形成，就由於生產統治着僅願生產，不願消費所造成的結果。須知生產不是爲生產而生產，是爲消費而生產，這才是真理。自然，我們在這裏所說的消費包含着一種廣泛的意義。無論是爲了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命，四種民生需要上的管、教、養、衛，都是消費。而用在再生產的工具上或積蓄上，最後的目的，又何嘗不是消費呢？孫中山先生「分配社會化」的主張，一方面批評了資本主義的生產，一方批評了「剩餘價值論」。蘇聯的計劃經濟雖解決了這一矛盾，但在理論上不便拋棄馬克思主義

的基本論點，所以仍不能說明。就最近所讀到的若干蘇聯經濟學的經濟理論文字中，知道蘇聯的經濟學者正努力從理論上求得解答。可是如不批判了『剩餘價值論』，這一新的理論是建立不起來的。（這裏我們又看出『知難行易』的哲學的實際應用來）。

馬克思的着眼點既着重於生產過程，所以他分析出了一種『社會必需勞動』的理論來。這一理論之建立是馬克思價值理論的功績之一。但他自己以及恩格斯列寧等都尚未予以充分的說明。

資本主義前

我們先分析一下資本主義社會前的情形。

一個懶惰的靴匠三天才做一雙靴，一個勤勞的靴匠一天做一雙靴，一雙靴的價值是一天的勞動呢？還是三天的勞動呢？馬克思從『社會平均必需勞動』的理論解答了這一問題。這種『社會必需勞動』是視生產力的情形而不同的。靴的價值須視當時社會上若干靴匠對於製造一雙靴所耗『平均必需勞動時間』來決定。

可是這個懶惰的靴匠不僅懶惰而且浪費，每天喝酒，吸煙，甚至嫖賭，無所不來，他三天做一雙靴的代價不夠他浪費的時候，他才停止浪費。這個勤勞的靴匠不僅勤勞，而且節儉，每天只求溫飽就夠了。每天做一雙靴的代價夠他六天的開支。於是他每六天就有五雙靴的代價積蓄了起來。

個月可以積纒三十天的代價。他爲使他的靴子容易出售起見，他便減低靴的價格，在一雙靴的代價夠他五天至三天的開支下來出售。

如果這個懶惰的靴匠所以能夠懶惰的原因，是由於他祇有一個人，不要供養父母妻子。這個勤勞的靴匠有着三個不能勞動的年老的父母和病幼的妻兒，那就是說，他有着社會的負擔，每天做一雙靴所付的代價僅夠養家，有時還不夠。因此他便只得更勤儉一些。如果一個有家眷需要給養的靴匠既懶惰又浪費，他的父母妻兒便會貧困，經常受着凍餒，至於營養不足，有病無錢醫治，不能受教育，乃至衰弱而疾病早亡。

在這裏，我們已經可以看出消費對於勞動及財富的積纒所生的關係來。

僱傭勞動

到了僱傭勞動存在的時代，出現了勞動者離開了他的生產工具和任何生產手段而被僱的情形。僱主對於僱傭工人支付着一種平均的工資，這種平均工資的水準對於一個人平均消費的開支足夠了的（再低僱主就僱不着工人，懶惰的工人在他是不要的），對於有家眷負擔的工人就首先顯出不夠來，而社會的交換價值是按照「社會平均必需勞動」和「社會平均必需消費」來做爲水準的。於是這個僱主在這裏找着了他所要找的東西，拿來供自己享受或積纒。

歷史的圖畫

在奴隸社會中，奴隸所有者既不與奴隸以足夠的食，更不給奴隸以足夠的衣，自談不上安適溫暖的住所，對於奴隸的家眷那是完全不管的，奴隸最好是不結婚。奴隸所有者享受着奴隸終日辛苦的勞動，而不予以足夠的營養和安適的生活，造成奴隸的易病早死，人口的衰落。奴隸的短命一方面由於過度的勞動，一方面由於未能適量的消費。如果奴隸適量的消費了，在生理限度以內辛苦的勞動，是可能保持常人的壽命的。

在歐洲的封建社會裏面，農奴將自己及一家人終年勞動的收穫的一部份，應該留給自己消費的一大部份，貢獻給領主，供領主不勞動而奢侈的喜樂。領主花錢組織軍隊，僱用法官壓迫着農奴進行他們的義務。使得農奴窮困而凍餓。

在中國的封建社會裏面，地主向佃農征收着一半的收成。由官僚構成的統治機構，向人民進行着無饜的剝削。一個窮光蛋的秀才一旦中了舉以後，有了陞官的機會，就有了發財的機會了。官僚發了財是以變成地主為其歸結。所以官僚代表着地主的利益，保障着地主享受佃農生產的一半，不勞動而享受；使佃農不能享有其收成的全部，受着凍餓，一家人易病早亡，兒子不能受教育。一個洗手的江洋大盜也是可以地主的身份來安享餘年的。

在私有制度下，家庭是社會的基本構成。一家中的老少是須賴少壯者來給養的。而從上述這些圖畫中看來，剝削者所剝削自勞動階層的，是他們消費的不足額，尤其是老年的父母和幼年的子女的消費的不足額。當然，所有的消費品都自勞動力產生的。可是，如果勞動者都能獲取其收成的全部以供自己及一家人的消費享受時，豈不剝削關係就沒有了嗎？

這裏更說明了一切剝削的對象是別人的消費，尤其是老幼者的消費，這些并不是甚麼「剩餘價值」。

生理的意義

在生理的科學上分析起來，勞動力的消耗是身體熱能 (Heat Energy) 的消耗，具體勞動之所以能抽象化的原因，即由於無論任何種的具體勞動，靴匠、裁縫、車夫、機器匠、文學家、思想家、政治工作者……所耗費的勞動量都同為熱能量的原故。而食物空氣是熱能補充的來源，衣與住則足以保持已有的潛熱。一個人空手步行所耗的熱能量與負重十公斤步行和等的距離時所耗的熱能量是不相同的，後者要多於前者。兩個同負十公斤的人步行，一個行三十公里，一個行四十公里，行四十公里的人所消耗的熱量較行三十公里者為大；因而更感到疲勞（參讀拙作『生命能論』，勞動季報第八期，文中舉得有科學家測驗出來的數字統計材料）。每天消耗了的熱能量是可以藉適量的食

物與舒適的坐臥休息來補充還原的。一個偶然過度的勞動者可以藉足夠的食物份量和休息來恢復其所過度消耗的勞動量。兩個同年齡同健康的人一同負重十公斤，在同一天內步行至十公里；某甲則歇宿於一家設備舒適的旅館內，有熱湯熱水沐浴，豐盛的飲食，整潔的被褥床鋪，空氣清新的房間；某乙則在一家冷鋪裏等了一晚，祇吃喝了一點冷湯冷飯，睡在一個空氣醜醜的房間裏，被褥上有着甚多的蚤虫等。這樣，這兩個人的生理上一定發生極不同的影響。兩人的生活這樣相歧下去，我們可以看出兩人生命不同的前途。

足見一個人在他的生理限度以內支付了他的勞動力所發生的問題，主要的是在他是否能得到足夠的消費品，是否得到足夠補充其消耗了的勞動力的飲食、休息、睡眠、娛樂等。此外，就在他的年老和幼小不能勞動的父母妻子由誰來給養，祇這一些簡單的事實，已足將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根本推翻。馬克思在『必需勞動』與『剩餘勞動』劃分之下，將一個在僱的工人是已經得到了他及其家人生活所必需的資料後，然後將剩餘買納給僱主的。通俗說來，一個勞動者喝足了，吃飽了，祇在對他的生理上（包括他的家人的生理上）不發生妨礙的情形之下，多替僱主每天做幾小時的工而已。他工作時間愈長，僱主的剩餘愈多，乃產生『絕對的剩餘價值』。工時不變，工資減低，乃產生『相對的剩餘價值』。這種分析的方法顯然與事實不符。

在產業革命以前的情形，僱主從來沒有用「社會平均必需消費」的代價來僱傭工人。如果僱主這樣，他們就無可剝削了。所以將資本家雇主所付工資作為勞動力的價值，認為已經包含全部「生產維持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所必要的勞動時間」，那是一種不合科學的理論。這種理論是欠誠實的。

就所需要的生活資料——恢復勞動力所必需時生活資料來作為勞動力的價值，是馬克思正確之處，但僱主從來沒有付夠了的，如連同雇工人計算，則更差得遠。惟有帝國主義國的「工人貴族」得有機會享受到。但這就是就消費來計算價值，不是就生產來計算價值。這一點在下面「從工人身上所剝削的部份」一節內還要詳細的加以分析。

產業革命後

產業革命後的情形，更將「剩餘價值論」的破綻擴大的顯現了出來。

一個手工業的裁縫的「社會必需勞動」是每天作一套衣服。有了機器以後，一個裁縫的「社會必需勞動」可以每天作十套了。機器要有錢的人才能購買，於是沒有錢的裁縫仍然每天作一套。有機器的人每天可以有九套的「超額利潤」了。但這種「超額利潤」是不能長遠的維持的，久而久之，機器使用普遍起來，裁縫的工作自會逐漸降低，那位沒有機器時裁縫只好去替別人幫工，而

有機器的人仍然還有比較沒有機器的時候高得多的利潤，一直到這種機器爲全世界每一個裁縫都採用了時，這種『超額利潤』才消失了。

情形并不這樣簡單。一個經過官僚的剝削或強盜行爲獲得了若干原始資本的人，會購買了若干部機器，僱來若干無力購買機器的裁縫，替他生產這種『超額利潤』。衣服是人人要穿的，機器則不見得人人都立刻去買。而『超額利潤』的獲得者更可以購買更新式的機器來減低活人的勞動及所應對這些僱來的裁縫支付的消費代價。在這一過程之下，有機器的人一天比一天富足起來，享受優裕的生活，還有若干積累來擴大工廠，同別人競爭。沒有機器的人祇夠自己一個人吃飯。一旦因病失業，便有餓死的可能。有家人待供養者，其境况自更惡劣。於是造成工人反對機器的運動。因爲機器剝奪了從事勞動的工人大衆的一小片麵包，并把他們委諸慘酷的餓死。一七五八年，英國有幾百個失業者焚燬了一部用水力來磨毛的機器。當亞爾克賴特的機器出現的時候，有五萬人向議會請願把牠燒掉。

當機器生產品祇在有機器的國內銷行的時候，手工業紛紛破產，失業的工人向都市工廠尋找工作，有機器的資本家將機器製成品向失業者和工人及其家中老少出售，起初還有銷場容納，失業者和那些依然用手或其他落後的工具工作的生產者（因爲機器的採用在各種不同的生產部門中，在私有

制度未廢除以前，是永遠不平衡的。完全以消費者的資格供給機器所有者以「超額利潤」，而在工廠的工人則為直接被榨取者，同時也是以生產執行者和消費者兩重資格來向僱主納貢。

經濟恐慌

可是擁有生產力擴大了的機器的資本家，其所以從事生產的目的，並不是爲了平均分配了來供給消費，而是爲了利潤。他們將每天的生產品以能獲取利潤的條件下向消費者出售。機器的生產力是擴大了，而一定區域的消費者——人口——是有着一定的限度的。專爲利潤而生產的資本家，未暇顧及消費者的胃口究竟有多麼大，每天開足機器儘量的生產，久而久之，當消費者的荷包已被掏空時，他們的購買力自會減低起來，由工廠製造出來的商品勢必有一天堆積在市面上賣不出去。在這種情形之下，工廠主看見棧房裏堆的貨物推銷不動，他祇能停止機器的轉動，將工人趕到街上成爲沒有收入的消費者——失業。

這就是經濟恐慌的由來。

在經濟恐慌的時期，一切商品的價格陡然低落下來。可是在許多地方，却因有許多東西賣不出去，或者正確的說，因爲出賣時要賠錢，更談不上利潤，所以物主甯願將其燒掉，或倒在海裏，加以燬壞。一方面却有着千百萬流浪的飢餓者。

在這種情況之下，失業者的勞動力已是僱主們所不需要的了。僱主們關了工廠的門，想法等堆在棧房裏的商品在不賠錢而仍能獲得利潤的條件下，那怕利潤少一些，售出淨盡以後，再來開門。那些資本太少，等不及的僱主，自然很多的破產了。而失業者所要求的，仍祇是適量的消費，市面上一乃發生搶麵包的事情。因為他們已經沒有了可收入的工資來購買必需的消費品。在平時，他們祇是感到消費量不夠，在經濟恐慌時期，連消費的全部權能都喪失了，即生活權都喪失了。

資本主義國家遇着了這種事情，有兩種辦法來渡過經濟恐慌的時期：在國內，給失業者以少量救濟金，使得能購買少量的消費品以維持他們活命，同時可以使堆積在棧房的貨品推銷出去；主要的還是盡力擴充國外市場，從國外的消費者身上獲取更高厚的利潤。

歷史給了一個最好的機會，地球上存在着一個極其廣大的面積和衆多的人口，生活在產業落後的經濟狀態之下。機器生產品向這些地方去推銷，初初還遇到一些阻力，一旦統制機構和買辦機構建立以後，機器所能加速的生產力，却可能的找到其生產品的市場。十九世紀初二十世紀的上半年期，資本主義的經濟恐慌都賴嫁禍於產業落後的弱小民族來克服。可是地球上的面積究竟是有限的，而生產力之擴大又似無窮。於是經濟恐慌乃一次比一次加深其程度，直至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三年的恐慌已呈出極其嚴重的形態。有許多國家某些部門的生產，直到現在還未恢復一九二九年時代的水

準；大多數產業先進的國家則盡其擴大了的生產力來擴充軍備，準備搶奪殖民地，其結果卒至造成毀滅生產力的世界規模的戰爭。而弱小民族國家的人民乃益趨於貧窮化。惟有按着消費計劃來生產的蘇聯，才沒有捲入這個漩渦。

有機器的人賺沒有機器的人的錢，是社會價值，不是馬克思所謂「剩餘價值」。

生產消費之不平衡

經濟恐慌的事實，說明了在生產不是爲了供給「社會平均消費」，而是爲了利潤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裏面，是會發生因生產過剩而引起的病態。本來，生產過剩應該可以使得物價低降，平均消費提高，人民生活容易。現在反造成了相反的結果，自然是一種病態。這種病態是私有制度所引起的，生產力之擴大原應以提高全社會乃至全世界人的平均消費，乃經少數人據爲私有，藉生產力擴大之不平衡，與社會消費之不平衡，將價格相對的提高了起來，從廣大的人羣中獲取利潤。結果卒至有許多東西弄得一錢不值，或用火燒掉，或倒在海裏，而若干人則得不着適量的消費。最近我們在報紙上讀到南美洲的咖啡因歐戰影響難以運銷，大量的焚燬，事實上許多地方的人（重慶就有許多人），想喝咖啡喝不着，嫌太貴。

被焚燬的咖啡是不是需要農業勞動者的勞動力來生產呢？藏在這些咖啡裏面的「剩餘勞動」爲

甚麼沒有盡其供給資本家以『剩餘價值』或利潤的功用，而等於白白裏耗費了呢？

馬克思主義者看出：不是所有的勞動都能產生價值。但問題並不在這裏。而是任何經過勞動力所生產的商品，在沒有人要用以供消費的時候，該項商品的價值就無由實現。

在資本主義社會下，交換價值表現了價值的尺度。但使用價值才是價值的基礎。有人買的商品是有人使用的商品。空氣和日光具有使用價值，在平時因其無須耗費人類勞動力即可使人人平均充份的享受，所以產生不出人類社會的交換價值來。但在人口繁多的城市的旅館能享有充份空氣日光的房間一定要貴一些。土地也一樣。資本主義社會所進行的生產是爲了利潤，而不是爲了使用，這是資本主義社會一切病狀的根源。

這不是奧地利學派的『效用價值』說。而是孫中山先生的社會價值論。奧地利學派根本否認價值是社會關係。其不同處是很顯明的。

價值是勞動所產生的。日光、空氣、水、電……的使用價值都由自然界的勞動（運動）所產生。但牠們的交換價值須待參加到人類社會關係中來才能具有。到了城市中，日光、空氣、水，都成了有交換價值的東西。不僅因其一部份經過了人類勞動，而是因其不能平均消費。在人類社會中，一種經勞動力所產生的商品，到了找不着消費者的時候，可能喪失其全部的價值。而消費者在所需

要的商品不足的時候，可能將該項商品的價值抬高。一種本來完全沒有價值的東西，經有人發覺其有用以後，可能立刻變成具有價值的商品。

生產的過程須到了消費完畢才算終了。一件生產品在沒有人消費時，即可以說是沒有達到生產的目的。而價值是須經過從生產到消費的全過程才能由具有而實現的。

交換之所以能成立，是由於有人要拿這件商品去供消費。人類的社會關係雖藉商品之交換來表現，但交換的本身祇是一種過程。商品的價值藉交換表現其尺度，而其實現則須待有人來消費牠。資本家的利潤的一部份是從雇工身上所沒有付夠的應有的工資，即沒有付足以供「社會平均必需消費」的工資中預先扣了下來（見下節）；一部份則取自私有了人類歷史社會勞動的積聚的生產手段所擴大的生產力，未將剩餘生產品供社會消費，尤其是老人、小孩，病者，而以之出售。

在這裏，我們才能找到「價值是社會關係」一話的正確的解釋。經過了自然經濟的時代，魯濱遜式的獨自的生活已經祇能做為一種傳說了，而不是一種普遍的事實。分工以後，一切生產和消費都有了社會的性質，於是才產生社會關係的價值來。

到了資本主義時代，「資本」成了最有價值的東西，因為「資本」在這時候成了「一種歷史上特定的社會生產關係」，（列寧語）資本家私有了這一應歸諸社會所公有的機器，讓大多數人在「

社會平均必需消費」的水準以下來生活，他們少數人則擁有大多數人用勞動力所生產的財富。人類的祖先辛苦艱難創造下來的生產力，原爲了全體人類子孫來消費，來維持更舒適的生活，但他們掠奪了去作爲私有，并用來剝削社會人羣，使自己益趨於富有，別人更趨於生活艱難。其結果卒造成了使得大家生活不安的動亂與戰爭。

在生產過程中，資本家得不着利潤，甚至還可能的賠本。惟有所生產物品當其以商品的形式用較成本高的價格出賣給消費者或販運者時，他的利潤才真實的到手了。價格不能單獨由商品所有者來抬高，在生產力不平衡的擴大時，在消費者不平衡的社會中，在交通困難時，在某些地區發生災患時，在社會對某種商品的消費量特別增多時……許許多多其他社會的原因才促成了物價之高涨。

產業革命後，資產階級高厚利潤主要的來源是由於消費的不平衡與生產力不平衡的擴大。一方面破壞了落後的生產力，一方面藉比較價廉物美的商品壟斷了市場，造成了若干人的破產，使在不夠消費的工資水準下工作。因其全世界的意義，所以利潤乃愈高厚。產業落後的國家，手工業者被價廉物美的舶來品所迫成爲失業者了。若干年積聚的財富都因購買舶來品以及種種與這一事實有關所受的剝削而流到帝國主義統治階級的荷包中去。

所以勞動時間成爲價值尺度的基礎的原則，到了現在發生了這樣一個問題：在產業革命後，間接勞動多於直接勞動，即社會的意義多於個人的意義，多數人的意義，多於少數人的意義。而社會多數人去能享有因產業革命所增進的生活幸福，全被少數人所劫持，任大多數人生活於『社會平均必需消費』的水準以下，這才是資本家利潤來源主要的說明。

從工人身上剝削的部份

資本主義先進國的資本家，對於國內的工人，初初要求其每日作長時間的工作，而付以不夠『社會平均必需消費』的工資。這裏的社會關係恰恰是相反的情形，工人是商品（勞動力）的所有者，資本家因其私有了生產工具，成了勞動力這一商品的形式上的消費者了。事實上，資本家祇是勞動力的僱用者。在這裏，因爲下列相反的情形，工人不僅不能從出賣其勞動力得到利潤，反而在『社會平均價值』的水準之下出賣其勞動力，因而勞動者成爲被剝削者了。

第一，勞動者在歷史地位上總是生活在『社會平均必需消費』水準之下的人羣。資本家可以在供『社會平均必需消費』以下的工價僱用他們。資本家在這兒已有大宗的盈餘。

第二，資本家對於勞動者幼年的教養和老年的供養，疾病的醫藥，并不需要負任何責任。這種情形特別在工業初發達時，政府不知道去顧及，後來才漸漸略有設施，但在私人資本主義制度下永

這是不夠的。

第三，當若干青年的單身勞動者在祇顧及簡單的消費即可出賣其勞動力時，那些有家眷待供養的勞動者就祇有從事超『社會平均必需勞動』而勞動。於是小孩也勞動，老人也勞動，婦女在生育小孩時也勞動，病人也勞動，……勞動後備隊多起來了，社會必需勞動力過剩起來，工價乃愈趨低降。

第四，勞動者羣是人數衆多的一羣。資本家對於僱用勞動者并不顧及其是否疲勞過度，營養不足、生病、家庭狀況怎樣……因為某甲不來，有某乙、某丙、某丁無數人會來。

第五，資本家在工廠所出產的商品不能獲利的時候，即生產過剩而發生經濟恐慌的時候，可以立即停僱勞動者。勞動者失了業就沒有了工資的收入，沒有錢購買消費品，即等於沒有了生活的權利。這是資本家所可不管的。

第六，資本家是在社會所公認的一種平均工作時間與工價的條件下僱用工人，但這種工作時間與工價是在有利於資本家的條件下，永遠與社會應有的平均水準不符的。對於工作時間在生產利潤高時則將其延長，生產過剩時則盡量縮短。工資則永遠低於擴大的生產力的社會應有的水準。

第七，最後，勞動力確實是一種奇特的商品，牠之所以奇特，不在於牠之『能生產比牠自己的

價值更多的價值』，而在牠被使用了又可以復原。在使用時消耗了的一定量的熱能，可以藉空氣食物來補充。空氣是不要錢的。食物雖有時不足，所受的影響很遲才顯現出來。僱主對於勞動者得了病可以完全不管，工人之早衰早死，可完全不當心，所以僱主可以用比勞動所產生的價值較賤的工價僱用着長時間的勞動力。

工資是勞動力的價格。通常勞動者應以一晝夜為工作與休息的生活單位。在這種單位下，勞動者每日所得的工資是一整天勞動力的代價。勞動力是當作一種特殊的商品在市場上買賣的，其所以『能產生比牠自身的價值更多的價值』，乃在勞動者恆生活在『社會平均必需消費』的水準以下，所以資本家可以降低勞動力的價格即可僱用着牠。資本家對於所僱工人過度的疲勞並不顧及，所以祇要勞動者不發生社會的反抗，或生產過剩時，資本家總是希望工作時間盡量延長。資本家對於勞動者適量的消費也是不顧及的，所以他們希望工資盡量降低。可是工資降低了，勞動者的購買力也減低了，工廠的生產品沒有了銷場，就會發生經濟恐慌。工作時間與工資所受社會關係的調節，在私人資本主義制度下，最後仍是有利於資本家。因政府的機構是在資產階級的手裏。而勞動者所享受的消費水準又永遠在適應生產力的『社會平均必需消費』的水準之下。貧富階級的懸殊，足以引起社會問題之嚴重。集合在一地生活，工作與消費在一個水準的勞動者，自易產生一種同情，

從而產生了近代的工人運動。

這說明資本家從所僱工人身上剝削來的，是一種社會應有的消費量。從社會組織機構的混亂，在有利於僱主的條件之下，資本家將這些應供勞動者及其家人消費的價值剝削了來，作為已有。工人則在因甚要負擔老小生活和疾病醫藥等費用，而自己的收入永遠不夠消費，所以只有忍受長時間的勞動，從而早衰、早死、小孩容易夭亡，弄得自己鳩形垢面，天天難得一飽，度着愁苦的生活。要等到大家覺悟起來，才起來革命。

轉向弱小民族身上剝削

到了帝國主義的時代，新式機產的商品生產成了剝削弱小民族的機構了。在弱小民族的國家，『社會平均必需勞動』是較高的，而『社會平均必需消費』是較低的。新式機器的生產因生產力之擴大與生產量之增加，原應提高『社會平均必需消費』，而降低『社會平均必需勞動』的水準。但因機器之私有，資本主義者反利用低級的消費與過度的勞動來產生其所期望的利潤。在產業落後國，他們對於購買原料僱用勞動者，則採用落後國的價格而略為提高；對於出售商品則採用本國的價格而觀世界市場商業的情況而競爭而升降。機器生產品因其標準化、花色多、適用……諸多方面較手工業製造品為優，在其本身已足排斥手工業製造品，再加以貶價傾銷，手工業製造品的市場乃完

全被奪了去。於是落後國的手工業者乃逐漸的破產了，所有若干年社會勞動的積聚大量的流向外國去。資本主義先進國的平均財富乃日益增加了起來，其『社會平均消費』也隨而提高了。自然，私有着生產手段的人們的消費和享受總是永遠優於無產者的。

可是，這樣就可能的解決了一個『問題』。因『社會平均消費』可以提高了起來，資本主義先進國的資本家可以多給所僱勞動者以較高的工資了。帝國主義國的政府也得從所得稅和遺產稅中取出一部份來辦理社會事業，如救濟失業、保險、開設免費醫院，……等。勞動者在平時，在沒有發生經濟恐慌和沒有戰爭的時候，已相當的可以感到生活上的安適，尤其是那些『工人實族』，從而減低其對資產階級敵視的程度。那就是說，帝國主義國內的階級對立的形勢從而緩和了。帝國主義國家的統治者剝削的對象從國內勞動者和消費大眾移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弱小民族的身上了。他們還可以分潤一些剩餘給那些工人運動的『領袖們』，叫這些『領袖們』安靜一些，並且還要進而擁護帝國主義政策。第二國際的『領袖們』，如考茨基等，便這樣背叛了馬克思主義。英國工黨的『領袖們』便這樣製就了為一部份工人羣衆所擁護的『綱領』。

這時候，資本家的高厚利潤的大部份顯然并非取自其國內的工人階級。帝國主義國內的工人的工作時間較之殖民地的工人相當的縮小了。他們實行着八小時工作制，而殖民地則因了『特殊情形

『如國際勞工局所公認的特殊情形，乃能讓工人工作十小時乃至十四小時。工資水準在各國間都是不一律的。美國和加拿大的工資佔最高位，英國次之，歐洲各國又次之，亞洲非洲工人的工資再次之。中國的平均工資低於印度，約為美國平均工資三十分之一，約為英國平均工資十五分之一。』

美國人的平均食品中，穀物佔百分之三十八，肉食佔百分之三十九；中國的平均食品中，穀物佔百分之九十，肉食佔百分之一。爪哇人肉食更低於中國人。

我們可以說，一個美國或英國工人的消費量在平時可能的達到適應現代生產力的『社會平均必需消費』的水準，資產階級則遠遠之，殖民地弱小民族所享受的生活離這一水準遠得太遠。所以弱小民族反侵略的革命正領導現階段歷史的行程。

帝國主義國統治着高厚利潤以及鉅額財富的來源，即由於享有了經人類祖先歷史社會勞動所積聚的日新月異的生產工具。這些生產工具之創製原為普通改善人類生活程度，增進其消費與享受。現在經他們少數人壟斷了去，將其餘大多數人類應有的享受品變為私有，造出不平等的社會階層來。又因國內工人羣衆之反抗，乃將原係取自國內消費大衆的一部份利潤，勻了出來。但各階層間消費的水準仍極不平衡，所以階級對立的形勢依然存在。而當戰爭發生，或經濟恐慌襲擊時，尤其是

弱小民族革命運動高漲，帝國主義侵略失敗，使得現有的利潤水準不能維持的時候，才再回向國內無產的消費大眾，自然都是勞動者及其老幼的父母子女，加強其剝削。從而又引發國內的革命。

歷史社會的勞動積聚的兩種形式

一個中國的土財主，其鉅額財富的積聚大都由於一方面加強生產勞動，一方面消費吝嗇。財主公一方面強迫兒媳婦五更天以前就來燒火煮飯，一方面干涉兒媳婦房中所點的油燈裏面多用了燈草，或到時候用蘆草管從窗戶吹滅兒媳房中的燈，以節省油的消耗。這類故事在中國是普遍傳着的，佈亦因實有其事實。這樣的財主公對於地方公益事業從不破費一文。於是他的財富乃得積聚起來。可是一旦有了官事發生，要到縣官那裏去訴訟的時候，往往弄得傾家蕩產。又因其爲富不仁，這地方上人憤恨，也容易遇到強盜來打劫，遭到家破人亡的結果。

而強盜和官僚又都是可以，告老歸田，以地主的身分繼續剝削佃農來終其生的。直到他們的財富被兒孫浪費掉了，或者又被別人劫奪剝削了去，才又喪失了所有權。官僚和強盜都是可以積蓄若干珍貴寶物和文化藝術品的。他們如有了安份守己的兒孫，這些積聚的財富也可以保存若干年代。

到了外國貨進到中國來，若干的財主有些便因直接的吸鴉片烟，吸紅丸，就此窮了下去，弄得傾家蕩產。官僚所剝削的部份也很少積聚，而消耗在吸鴉片，享用外國消費品、尤其烟酒和化粧品。

上而化完了。中國的強盜則甯願拿大批經冒險劫來的錢財去買外國槍械，向外國軍火商人納貢。而強盜土匪也大多是鴉片烟吸食者。

中國財富的積聚的一部份便經這樣流到了帝國主義統治者荷包中去。這是帝國主義所剝削自中國歷史勞動積聚的一種普通的形式。

原始的積聚在生活上的意義乃爲了防止天災，或勞動力喪失的時候來消耗，如疾病、壯年死亡之類，『養兒防老，積穀防飢』，這是過去人類積聚的基本動機與要求。後來乃演成剝削對象了。

這種積聚形式在資本主義及以前的社會中都存在着的。在資本主義制度發展的過程中，歐洲各國有着若干的領主、貴族、小有產者，紛紛破產。他們祖先的積聚，無論剝削自別人的勞動生產品，或他們自己勞動的積聚，都跑到了新興資產階級的手中了。

第二種形式便是文化的積聚。

在本文上篇中，我們已經說過，世界產業發達到如此鉅大的規模，沒有中國五千年的歷史文化是不能想像的。事實上，今日世界上文化之所以能呈現輝煌燦爛的狀況，都是人類祖先的社會勞動積聚的功績。

新的機械的發明，新的制度的引用，都含有若干舊的因素在裏面。一個上古時代最聰明的人

雖然可以想在天空中飛行，但那只是一種空想。水力引用，進步到蒸氣力的作用，更進步到電力的引用，加上各式車輛製造的經驗，才有了汽車；再加上對於飛行動物形狀結構的分析與研究，才有了飛機。飛機的發明不知經過若干年的人類頭腦在想着自如的在天空飛行飛不起來的懊惱才有了的東西。有了第一架飛機以後，又經過若干人的傷亡，若干人爲求其機構的完整所耗的心血，才有了今日的形式。

一種政治制度也是一樣。許多政治家思想家從所生活的社會中體察過去政治制度的得失，提出新的理想，再付諸實施，再加上新的改進，代代相承，因生產力之擴大，才有了今日社會主義制度的具體的構成。證之醫藥藝術莫不皆然。

總之，無論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其發明、發現、創造、修改，……達到合乎真理，適於應用的程度，都是經過人類歷史社會的勞動積累。

帝國主義者間的參差

帝國主義者藉私有人類歷史社會勞動的積累以獲取高厚的利潤以自肥。但因世界生產力擴大之歷史的不平衡，又造出帝國主義自身發展的等差情形。

如英國，因其是一個產業革命先進的國家，佔有了最多的殖民地，全世界弱小民族的財富幾

乎有一半被英帝國主義者剝削了去。法國，所佔殖民地僅次於英國。美國，因有種種新式消費品的鉅量生產，如飛機、電氣器材、汽車、汽油，……等等，能以吸收全世界的財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英國的財富大量的流向美國去。因此出現了等差的情形，新興的德國、意大利、日本，所能剝削的就比較少了。

已有廣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帝國主義者擁有了鉅額的財富惟恐其或失，剝削的機會也是不能任別人搶了去的。新興的帝國主義者則相形不綽，於是大家盡力擴充軍備，將鉅額的財富用在製造殺人的武器上面；準備搶奪。這便是帝國主義戰爭發生的原因。一旦戰爭發生，便伴同勞動者的人肉共同送到前綫上去使之化為灰燼！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比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化的錢要多多了。一九四〇年底，英國每天化到一千萬鎊以上！他們不將擴大的生產力用於普遍提高人類的『社會平均必需消費』，而用之於殺人，用之於將數千年勞動積聚的建築物化成灰燼！

在這種情形之下，生產力發展極不平衡，社會消費的水準極不平衡，生產力之擴大沒有用於供人類普遍提高消費，大部份歸諸私有，且用來製造殺人的武器，已製成的可供消費的成品不供消費，將其焚燬或棄在海裏，或被燬在炮火中，有許多人整天的勞動不息，有少數人則自己日常的事，都要別人料理；……一切社會關係皆呈現出無政府的混亂狀態。資本主義社會的秩序，祇是剝削社

會的秩序。除此以外，一切都是混亂的，所以價值的規律，在這裏祇能就利潤率來尋找。而利潤率又是極其不平衡的。

『社會平均必需勞動』是爲了『社會平均必需消費』

在這種生產與消費過程極度的混亂中，很難找到一種價值運動的規律，尤以在戰時，或災變發生，或經濟恐慌的時候爲最甚。而當生產工具一日不離開私有制度，即一日不能使價值趨於穩定。價值須待『社會平均必需勞動』是在爲『社會平均必需消費』的時候，而又當消費大眾享受到了『社會平均必需消費』的時候，不是爲私人利潤的時候，才能呈現牠的規律性。到了那時，一切物品的使用價值將提到很高，提高到一切都適合於人類生活上普遍的要求。而交換價值則將降到很低，降低到人人祇要需要一件物品就可以很方便容易的得到。要這樣就須該人人貢獻其『社會必需勞動』於社會。

『社會必需勞動』不僅是指在生產某種成品時，社會生產力所必需的平均勞動量而言，還含有人人都須在一定的往活期間爲社會而勞動若干年月的意義。這種勞動是爲社會的必需而貢獻的。這種勞動的生產工作不僅足夠供勞動者的消費爲已足，還要供社會其他不能勞動的人的消費。而一個人在與世孑孓生了出來，他就有享有『社會平均必需消費』的權利，會貢獻其畢生勞力於社會的老

人更一樣應享有這種權利。但當他壯年的時候，就須按照當時生產力的情形而貢獻其勞動力於社會，以從事適量消費品的生產與再生產。

『社會平均必需消費』的意義和『平等工資』是不相同的。在社會主義的初期，『平等工資』是不可能的。但人類却要求人人的消費都能得其『平均』毋使富者高樓大廈朱門酒肉臭，貧者則無立錫之地，終日不得一飽。這裏所謂『社會』的和『必需』的，是含有爲社會所公認的合理而平均的意義。

民生是歷史的重心

人類歷史的行程在求得這樣一種生產與消費的平衡而有適量的富餘。但這一平衡在私有制度下永遠是難以找着的，惟有到了生產手段公有的社會中，一切生產勞動都是爲了增進『社會平均必需消費』的時候，才有找着的可能。當這種平衡失去其重心的時候即發生動亂。證之中外古今歷史莫不皆然。這種平均的重心是以人類平均生活的安樂爲依歸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也就是這個意思。所以 孫中山先生說：

『民生是歷史的重心』。

孫中山先生有關社會價值論語錄

孫先生關於社會價值論的言論是很多的，幾幾乎可以說全部三民主義都以這一經濟原理爲出發點。這裏爲限於篇幅，僅錄幾段最關重要的。

(一) 民族主義第二講全文——這裏指出帝國主義剝削中國及弱小民族所採取的各種方式及中國每年所受的損失，即中華民族每年所付給帝國主義的貢費。據估計這筆損失費每年約爲十二萬萬元，且將一年比一年增加。

(二) 民族主義中關於弱小民族與帝國主義者對立的情形說得很多。如：『世界上的十五萬萬人之中，頂強盛的是歐美的四萬萬白種人。白種以此爲本位，去吞滅別色人種。如美洲的紅番已經銷滅，非洲的黑人，不久就要銷滅，印度之棕色人正在銷滅之中，亞洲的黃種人現在受白人的壓迫，不久或要銷滅。但是俄國革命成功，他們一萬萬五千萬人不贊成白人的侵略行爲。那麼強暴的民族只剩二萬萬五千人，還是想用野蠻手段，拿武力去征服十二萬萬五千萬人。故此後世界人類，要分爲兩方面去決鬥：一方面是十二萬萬五千萬人，一方面是二萬萬五千萬人。……』(民族主義第四講)

『亞洲除日本以外，所有的弱小民族都是被強暴的壓制，受種種痛苦。他們同病相憐，將來一定聯合起來，去抵抗強暴的國家。那些被壓迫的國家聯合，一定去和那些強暴的國拚命一戰。』(

民族主義第一講

「列甯爲甚麼受世界列強的攻擊呢？因爲他敢說了一句話。他說「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十二萬萬五千萬人，一種是二萬萬五千萬。這十二萬萬五千萬人是受那二萬萬五千萬人的壓迫。」那些壓迫的人是逆天行道不是順天行道。我們去抵抗強權才是順天行道。我們能夠抵抗強權，就是十二萬萬五千萬人聯合起來。：我們提倡民族主義，自己先聯合起來，推己及人，再把各弱小民族都聯合起來，共同去打破二萬萬五千萬人，共同用公理去打破強權。」（民族主義第三講）

（三）關於社會價值正面的理論，以下面幾段爲最精采：

「照馬克思階級戰爭的學說講，他說資本家的盈餘價值都是從工人的勞動中剝奪來的，把一切生產的功勞完全歸之於工人的勞動。譬如中國最新的工業是上海南通天津漢口各處所辦的紗廠布廠，當歐戰期內紗布都是很賺錢的。各廠所剩的盈餘價值少的幾十萬，多的幾百萬。試問這樣多的盈餘價值是屬於何人的功勞呢？是不是僅僅由於紗廠布廠內紡紗織布的那些工人的勞動呢？就紡紗織布而論，我們便要想想布和紗的原料，由此我們便要推及於棉花：，棉花的農業問題，：棉花種子，……和種植棉花的那些農學家。當未下棉種之初，便不能不用各種工具和機器去耕耘土地；及下棉種之後，又不能不用肥料去培養結棉花的枝幹。我們一想到那些機器和肥料，便不能不想到那些

機器和肥料的製造家和發明家。棉花收成之後，要運到工廠來紡紗織布；布和紗製成之後，再運到各處市場去賣，自然要想到那些輪船火車。要研究到輪船火車之何以能夠運動，首先便要歸功到那些蒸汽機和電汽機的發明家。要研究到構造輪船火車是些甚麼材料，自然不能不歸功於金屬的採礦家製造木料的種植家。就是布和紗製成之後，社會上除了工人之外，假若其餘各界的人民都不穿那種布不用那種紗，布和紗當然不能暢銷；布紗沒有大銷路，紗廠布廠的資本家怎樣可以多賺錢，可以多取盈餘價值？就這種種設想，試問那些紗廠布廠的資本家所取得的盈餘價值究竟是屬於誰的呢？試問紗廠布廠的工人，怎樣能夠說專以他們的勞動便可生出那些布和紗的盈餘價值呢？不僅是紗布工業盈餘的價值情形是這樣，就是各種工業盈餘價值的情形都是一樣。由此可見所有工業生產的盈餘價值不專是工廠內工人勞動的結果；凡是社會上各種有用有能力的份子，無論是直接間接，在生產方面，或者在消費方面，都有多少貢獻。」

『像這樣講，就會在一個工業極發達的國家，全國的經濟利益不相調和，發生衝突，要起戰爭，也不是一個工人階級和一個資本階級的戰爭，是全體社會大多數有用有能力的份子和一個資本階級的戰爭。』

『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

利益有衝突。社會上大多數經濟利益相調和，就是爲大多數謀利益；大多數有利益，社會才有進步。

『階級戰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這種病症的原因，是人類不能生存，所以這種病症的結果便起戰爭。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所有的心得，只見到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到社會進化的原理，所以馬克思只可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家，不能說是一個社會生理家。』

『再照馬克思的研究，他說資本家要能夠多得盈餘價值，必須有三個條件：一是減少工人的工錢；二是延長工人工作的時間；三是抬高出品的價格。這三個條件不是合理，我們可以拿近來麵粉錢的工業來證明。大家知道美國有一個福特汽車廠，那個工廠極大，汽車出品極多，在世界各地都是很銷行的。那個廠中每年所賺的錢，要過萬萬。……我們用這個發財車廠所用的經濟原理來和馬克思盈餘價值論相比較，至少有三個條件，恰恰是相反。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資本家要延長工作時間，福特車廠所實行的是縮短工作時間；馬克思說資本家要減少工錢，福特車廠是增加工錢；馬克思說資本家要抬高出品價格，福特工廠所實行的是減低出品價格。』（以上民生主義第一講）。

『馬克思之資本論，主張資本公有，將來之資本爲機器，遂有機器公有之說。發明鐵道者爲司

的文生，發明機器者爲華特，經濟學者謂鐵道機器既爲二氏所發明，則鐵道機器二者之益應爲二氏所專有。殊不知機器雖爲個人所發明，然所以能發明者，其知識豈盡出於天賦乎？以受社會種種之教養，始爲發明機器之知力，及發明機器之機會。使生司的文生華特於荒島僻地，其智慧將何自啓乎？即使其天資極頂聰明，則耕而食，織而衣，以足供其一生之工作，尙何暇從事於機械之發明哉？由此可知鐵道機械，雖二氏發明，實二氏代社會發明也。社會之教養，原爲社會謀幸福之代價，二氏既藉社會之力發明機械，則機械即不能私有其利益，其利益即應公之於社會。……」（『社會主義之派別與方法』民國元年對中國社會黨講演詞）

『社會主義之國家，一真自由、平等、博愛之境域也。國家有鐵路，鑛業、森林、航路……之收入，及人民地租地稅之定納，府庫之充，有取之不竭，用之不盡之勢。社會主義者遂可進爲經理，以國家經費之餘，以謀社會種種之幸福。（一）教育，……（二）養老，……（三）病院，……（四）公共花園等。……』（同上）

（四）關於生產力之擴大與生產工作之私有，孫先生有極其明確的指示：

『這幾十年來，各國的物質文明極進步，工業很發達，人類的生產力忽然加增。着實言之，就是由於發明了機器。世界文明先進的人類，便逐漸不用人力來做工，而用天然力來做工，就是用天

然的汽力、火力、水力、及電力來代替人的氣力，用金屬的銅鉄來替代人的筋骨。機器發明之後，一個人管理一副機器，便可以做一百人或一千人的工夫，所以機器的生產力和人工的生產力便有很大的區別。」（民生主義第一講）

「所以機器發明了之後，世界的生產力便生出一個大的變動。這個大變動，就是機器佔了人工，有機器的人都把無機器人的錢都賺去了。……許多人一時沒有工做，沒有飯吃。」（同上）

「從前人類頂快活的時代，是最初脫離禽獸時代所成的共產社會。當時人類的競爭只有和天鬥，或者和獸鬥。後來……機器創出，那些極聰明的人把世界物質都壟斷起來，圖他個人的私利，要一般人都做他的奴隸，於是便變成與人爭極劇烈的時代。這種鬥爭要到甚麼時候才可以解決呢？必要回復到一種新共產時代才可以解決。」（民生主義第二講）

「外國用經濟勢力來壓迫中國，每年掠奪中國的利權現在有十二萬萬元。這十二萬萬元的損失不是完全用金錢，有一部份是用糧食。……雞蛋一項每年運到美國便有十萬萬個。北方的大小麥和黃豆每年運出口的也是不少。」（民生主義第三講）

「印度不但是糧食不夠，且每年都是有飢荒，但是每年運到歐洲的糧食數量，印度還佔第三位。這是由於印度受了歐洲經濟的壓迫。資本制度生產的目標是在賺錢。印度每年雖是有飢荒，那數

生產的資本家知道拿糧食來救濟飢民是不能夠賺錢的。要把牠運到歐洲各國去賣便很可以賺錢。」
(同上)

「外國運布來中國，他們不是來盡義務，也不是來進貢。他們運貨進來是要賺錢的，要用一塊錢的貨，換兩塊中國錢。……所以受這種壓迫的原因，還是由於工業不發達。所以中國的棉花都要運外國，外國的粗棉布還要買進來。……要出很高的代價，……要把很貴重的金銀糧食運到外國去抵價。」(民生主義第四講)

(五)關於土地問題，孫先生於述完那位漢洲醉漢拍賣土地的故事之外，(已引入本文上面)還說了很多。

「上海：廣州的地價比從前要增漲幾萬倍。上海：廣州的人口是一百多萬。如果上海的人完全遷出上海，廣州的人完全遷出廣州，或者另外發生天災人禍，令上海或廣州的人都銷滅，試問上海廣州的地價還值不值現在這樣高的價錢呢？由此可見土地價值增加的理由是由於衆人的功勞，衆人的力量。地主對於地價的漲跌的功勞是沒有一點關係的。」(民生主義第二講)

「所漲高之地價，應該歸之大眾，不應該歸之他人所有。」(同上)

「農民應該是爲自己耕田，耕出來的農品要歸自己所有。現在的農民都不是耕自己的田，都是

替地主耕田，所生產的農品大半被地主奪去了。這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我們應該馬上用政治和法律來解決。」（民生主義第三講）

（六）關於中國的經濟地位，除前面引過的外，還有：

『中國現在受條約束縛，失了政治的主權，不但是不能保護本國工業，反要保護外國工業。這是由於外國資本發達，機器進步，經濟方面已經佔了優勢；在經濟力量之外，背後還有政治力量做後援。……現在歐美列強，都是把中國當作殖民地的市場，中國的主權和金融，都是在他掌握之中。我們要解決民生問題，如果專從經濟範圍來着手，一定是解決不通的。要民生問題能夠解決得通，便要先從政治上來着手，打破一切不平等的條約。……』（民生主義第四講）

本文出版附言

(一)

『社會價值論』這樣大的一個題目，對於人類生活，可謂無所不包。我估計須要二百萬字以上的文章才能發揮盡致。在這裏，須要引證人類生活的全部史實，和一個歷史階段各種生活不同的人羣的實際生活狀況，須要引證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經濟狀況的全貌，才能加以充分的說明。上篇寫於偏僻的北碚溫泉公園，連三民主義都沒有一冊在手邊，許多引語，都是事後才補入。旋以原稿讀者指摘對於價值問題本身說得太少，乃從價值學說史的發展中，將社會價值的意義予以發揮。又以朋友們催促早日出版而草率完篇。將來當重新編輯一次，希望能拋磚引玉，引起同志們研究的興趣，引起社會各方面的批評，使這一偉大的理論能科學的健全的建立起來。

下篇關於價值學說史略部份，完全摘自李卜克拉西所著『價值學說史』一書，許多引語都摘自裏面。譯者孫寒冰先生將各家價值論重要語句原文訂於每段之末，使讀者沒有得到原書時亦能窺其大要，這是極便於研究價值學說者來閱讀的，給作者以甚大幫助。於此應向犧牲在敵機轟炸下的孫

寒冰先生致敬。

關於馬克思的理論，一部份摘自『價值學說史』，一部份摘自里昂捷也夫所著『政治經濟學教程』。就作者所涉閱的馬列主義的書籍來看，這兩部書中并無歪曲馬克思主義之處。況本文所批評的僅限於孫中山先生所管指出批評的兩點：即『剩餘價值論』與『物質是歷史的中心。』我願意讀者中的馬克思主義者盡力對本文加以深刻批判。『真金不怕火來燒』，真理是不怕批判的。

孫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中對於『Surplus Value』譯爲『盈餘價值』，原較『剩餘價值』爲正確。特市面上已多採用日本譯名，本文因之。將來再版時，當依孫先生譯名改正。

(一)

參考材料的缺乏，爲寫過本文時所感到的一種重大的痛苦。作者編勞動季報時，嘗爲了保存材料載入若干文章。乃一共出了十三期的勞動季報，因抗戰關係乃至一冊無存，真是一件極大的憾事。爲此有許多論點都未能充份發揮。

幸在上篇寫完以後，僑民函授學校要我寫一篇關於國際形勢的函授課本，便在七八兩個月中根據一些不完整的材料寫了一部四萬字的『二十世紀的國際局勢』。全部內容在說明二十世紀四十年

家，是帝國主義統治着這個世界。帝國主義國家在四十年中逐漸加強壓榨殖民地半殖民地弱小民族。因為地球面積有限，新舊帝國主義國家間且發生了兩次世界規模的戰爭，其原因則純粹爲了爭奪殖民地。并指出十年來新興帝國主義國家進攻半殖民地的事實：日本之進攻中國；意大利之進攻阿比西尼亞，阿爾巴尼亞、德國之進攻捷克、波蘭等。又四十年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恐慌因有殖民地關係而一次比一次加強其程度。同時，文化歷史最悠久的半殖民地中國和土耳其却發展着強烈的反帝國主義侵略的國民革命，領導着亞洲諸國弱小民族革命運動之進展。這本小冊子已經該校印發。

作者最近又擬寫一篇『鴉片戰爭一百年』。這篇文章裏面將注意蒐集一些材料以說明 孫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第二論中所說帝國主義剝削中國人民及弱小民族的許多方式。佐證中國在一百年來向帝國主義究竟納了多少貢物，以助長了帝國主義生產力之擴展。這是三民主義理論的經濟基礎，而且是鉄一般的事實。有了這樣鉄一般的事實才構成了 孫先生顛撲不破的領導世界弱小民族革命行動的理論。這種理論正爲佔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華民族奉行着以血肉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魔手搏鬥以求其實現。

自從上篇在中山月刊分期登載以後，間接直接得到各方朋友們不少的批評。在這裏暫不作答覆。我祇希望批評者將孫中山先生全集有關這一部份問題的遺教和本文參照詳細讀一遍。如有意見儘可用文字具體的提了出來供大家討論。社會價值論到了二十世紀已成了一個世界的問題。

有幾位朋友以為孫先生對於這個問題祇在民生主義中偶一的提到，值不得這樣擴大來討論，這是沒有明白事實真相的說法。

孫先生對於價值是社會的構成并不是偶一的提到。在民族主義中，十分強調帝國主義者剝削弱小民族的方式與鉅額財富的數量，對於弱小民族與帝國主義者對立的形勢也經再三着重的指明出來。孫先生在民族主義中幾次提到列甯，都是說：「列甯爲甚麼受世界列強的攻擊呢？因爲他敢說了一句話，他說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十二萬萬五千萬人，一種是二萬萬五千萬人。這十二萬萬五千萬人是受那二萬萬五千萬人的壓迫。」爲了列甯說了這句話，孫先生對於列甯一直是恭維的。

民生主義的全部基本理論的構成可以說都是由於社會價值論出發。孫先生對分配問題和土地問題提出來的方案，莫不基於這一論點。

在關於社會主義的講演中，指明任何一種發明并非那一個發明家單獨的力量，社會各方面都幫助了這種發明與發現的成功。

孫先生的這些意見，在本文附錄中還佔最重要的很少的部份。

(四)

許多朋友對於本文的寫成以及本書的出版予以極大的鼓勵和援助，還有幾位則校訂了交中書寫詞句欠妥的地方。在這裏，不及一一指名致謝。

民國三十年一月十七日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初版

中山文化教育館研究叢書 社會價值論 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陸角整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謝小岑

編行者 中山文化教育館

總經理 上海雜誌公司

支店

重慶	武庫街	上海	北河街
梧州	大中路	長沙	東長街
桂林	中北路	柳州	慶雲路
貴陽	長春巷	西安	南院門
成都	祠堂街	昆明	武成路

55
192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發給
審查證圖字第一七七四號

